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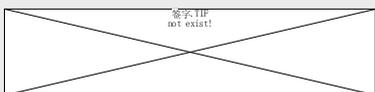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对地方志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五年来，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执着守望、辛勤耕耘，地方志工作成绩斐然，这项事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谨向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求真存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李克强

2014年4月16日



(双月刊)
2014年 第2期
(总第192期)

主管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办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马小彬

副主任：罗亚夫 王孝平

编委会：

马小彬 罗亚夫 王孝平

汪毅 高志刚 陈思祿

李冠华 邱俊 李思源

余正道 王少卿 周正琴

余崇威 邓力群 夏建平

张聂熙 何斌 冉炬

饶松柏 王华 杨文

李卫东 李学全 刘启蓉

尹克发 邓瑜 陶利辉

曾新苗 熊倩 孙玉峰

主编：马小彬（兼）

副主编：王孝平（兼）

编辑出版：《巴蜀史志》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熊倩

执行编辑：罗一洋

封面题字：何海霞

本刊地址：成都市永兴巷15号21楼

邮政编码：610012

编辑部电话：(028) 86522061

编辑部邮箱：bsszjb@163.com

印刷：四川川林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28)86980225

注：本刊如有印刷问题请与印刷企业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卷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地方志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时政辑要

04 修志问道 以启未来

——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07 发扬成绩谋划长远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 王伟光

10 陈越良调研指导地方志工作

依法修志

11 四川地方志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法制保障

罗亚夫

13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法理解读

刘应兵

志鉴研究

16 实事求是地对待市县志书的篇幅问题

颜越虎

19 加强志书卷首地图设置编纂研究

沈永清

22 方志资料与马克思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研究

陶利辉

25 浅谈部门志的编纂

龙祥云

28 第二轮修志信访工作入志思考

莫艳梅

30 从相似中探求弃弊趋利之法

王广才

32 地方综合年鉴彩页运作浅识

杜育和

34 与时俱进 力求创新

——地方志学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陈致英

史料之窗

36 民间文学中的南充蚕桑丝绸材料

文建刚 刘艳伟 闫小琴



- | | |
|-------------------|-----|
| 39 试说孔子访苻弘 | 张 麟 |
| 43 清代院试的准考证和补考证 | 彭 雄 |
| 45 成都僧众抗战期间义举史实解注 | 张 强 |

人物春秋

- | | |
|---------------|-----|
| 49 马识途与《XNCR》 | |
| 51 廖寅政绩文绩述略 | 丁禹强 |
| 54 德阳历史上的散文大家 | 姜 诗 |

风物名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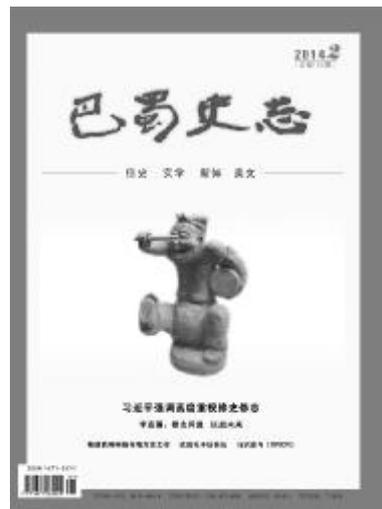
- | | |
|-------------------|-----|
| 56 成都东大路——逐渐逝去的古道 | 朱成文 |
|-------------------|-----|

人物访谈

- | | |
|----------------------------|-----|
| 58 南怀瑾:一个文人必须到过四川,一生才不会有遗憾 | 王国平 |
|----------------------------|-----|

简 讯

- 44 省志编委调研成都、内江、雅安地方志工作
- 62 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文理学院燕京图书馆签署项目合作备忘录
- 62 省志编委召开2014年度《四川省志》拟复审终审分卷承编单位座谈会
- 62 省志编委开展“4·20”芦山强烈地震抗震救灾志编纂培训
- 63 成都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
- 63 德阳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
- 63 《泸州市“七二三”抗洪救灾志》出版发行
- 64 南充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
- 64 巴中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
- 64 巴中市着力推进《巴中市地方志资料目录》收集工作
- 64 四川省千年古县专家组到合江县档案史志馆查核史志资料
- 64 泸县挖掘利用地情资料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封面：东汉击鼓说唱俑

汉陶俑是汉代成都地区雕塑艺术的特色，其创作理念突出地表现在对神韵的追求上，即在写实的基础上刻画精神，以形似求神似。成都各地出土东汉中晚期说唱俑甚多。塑俑艺人截取说唱艺术最精彩的说唱举动，利用形体夸张及人物面部表情变化来突出艺术形象。1957年成都天回山3号墓出土的击鼓说唱俑，人物面部的幽默表情被刻画得极为生动传神，不但是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的杰出作品，也是中国曲艺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实物资料。

出版时间 2014年4月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671—265X
 国内统一刊号 CN 51—1616/K
 邮发代号 62—311
 国内发行 四川省报刊发行局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广告许可证 川工商临许(2001)153号
 定 价 7.00元

修志问道 以启未来

——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本刊讯 2014年4月19日，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就全国地方志工作作出重要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会前会见部分与会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作题为《发扬成绩，谋划长远，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的工作报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在会上传达中央领导的批示和讲话精神，作《关于〈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草案)起草的说明》并作总结讲话。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布置全国地方志系统表彰先进工作。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主持会议。

李克强在批示中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



刘延东(中)会见参会代表并讲话

重要。五年来，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执着守望、辛勤耕耘，地方志工作成绩斐然，这项事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谨向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存真求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刘延东在会见部分与会代表的讲话中指出，召开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是地方志工作的一件大事。我们刚刚纪念了改革开放35周年，今年也是新中国成立65周年，还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这时召开这个会议，非常重要。

刘延东指出，地方志是传承和彰显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月25日考察首都博物馆时指出，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李克强总理对这次会议的召开非常重视，并且专门作出重要批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批示，都深刻阐述了做好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意义，也对下一步地方志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总书记的讲话和总理的重要批示立意高远，催人奋进，对地方志事业和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刘延东充分肯定五年来地方志工作取得的成绩。她说，地方志工作及其成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和增强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延东强调，中国作为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璀璨的历史，编修地方志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代相传、文明的代代相传以及中华民族的血脉相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意义十分重大。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和李克强总理批示精神，进一步做好地方志工作，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一是进一步提高认识。我们必须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从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高度，来认识编修地方志的重要作用。地方志不仅记载了古代历史、近

代历史，也全面详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历程，记录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记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这些将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所以，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既能展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也能体现现代文明和历史文化的一脉相传，特别是能够很好地总结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独立自由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当前和今后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志是我国大的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地方志从文化角度看也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地方志工作提升到战略高度来认识，要把地方志编修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基础事业来抓，进一步推动地方志事业和工作更加繁荣，实现新的发展。

二是进一步明确职责。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政府管理和发展地方志事业的重要职责。各地要真正做

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要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到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要发挥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的职能，动员和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编修，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要把解决问题和建立长效机制紧密结合起来，从地方志工作和事业发展的要求出发来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提高工作水平，推动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地方志工作要扩大宣传，应该把地方志用活，要编成很生动的书，要在全国青少年中鼓励阅读地方志。一个地方生长的每一个人，对家乡的历史文化都应该有所了解。

三是要加强质量管理。地方志不同于一般的研究论述，志书的质量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根基所在、活力所在和价值所在。在修志过程中，一定要始终把坚持质量作为第一原则。要认真总结修志的经验教训，深化对地方志工作规律和特点的认识，特别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定要坚决地反对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对地方志工作规律的认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用马

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来指导地方志工作。在地方志编修的全过程中，要有科学的、认真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作风，要把质量意识贯穿于修志工作的始终。质量意识是第一原则。要加强对地方志包括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编纂的业务指导和服务。地方志工作机构要综合运用执法检查、行政督察等手段，完善资料报送、志稿评审、质量评价、审查验收、批准出版等制度，打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也无愧于民族的系列精品佳志。

四是要进一步加强开发利用。地方志是座巨大的文化宝库。现在我们存世的旧志有8000多种，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新编的省市县三级志书也出版了7300多种，还有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乡镇村志数万种，字数已达到百亿计，形成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所以地方志是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地情，了解地方发展历史，探索历史的规律，提炼历史智慧，承接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希望各级党委政府要自觉地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当中，加快方志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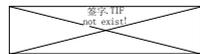
情网站、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对地方文献资料的专门研究，重视地方志资源的普查摸底，要开展数字化、网络化的建设，要做好地方志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这也是一篇大文章。

地方志编纂工作不要变成单纯的事务性工作，要学以致用，修以致用，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很好的结合起来。各级领导干部要读志、传志、用志，用历史的智慧和现实的经验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修志要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实现三个自信结合起来，要和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要和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结合起来。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我们的工作，真正编出科学的地方志。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发挥优势，创新服务手段和方式，拓宽服务渠道，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利用地方志，传播地方志。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承担着传承文明，记录历史，弘扬文化，服务社会的使命和责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在实现两个百年和中国梦的历程中，地方志工作大有可为。希望大家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增强责任感、使命感，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扎实有效地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开创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此次会议是2013年12月6日第五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成后召开的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解放军、武警部队主管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同志和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及副省级城市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以及国家有关部委局史志机构负责人约150人与会。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越良、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等参加会议。

又讯 4月21日，省志编委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史读史用史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在考察首都博物馆时对地方志工作发表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李克强总理对地方志工作所作的重要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会前与部分与会代表座谈时的重要讲话。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主持会议并传达第五次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并安排了学习贯彻工作。党组成员、副主任罗亚夫，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孝平等参加学习讨论。



发扬成绩 谋划长远

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

□ 王伟光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五届一次会议要求，总结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五年来的工作，分析当前地方志事业发展形势，明确地方志事业奋斗目标和今后五年的工作任务，审议《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草案），集思广益，再接再厉，努力开拓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五年来的地方志工作

五年来，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改革大局，辛勤耕耘，

奋发有为，地方志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地方志事业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第一，修志工作取得重大成果。首轮修志任务全面完成，全国累计出版规划内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5900多部。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深入展开，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修志规划任务。全国出版规划内三级地方志书1000多部，累计出版1400多部；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编修成果丰硕，累计出版2万多部；乡镇志、村志编修方兴未艾，累计出版4000多部。水利、海关等系统的修志工作稳步推进。全军第二轮修志任务基本完成，启动军事大事记和《中国军事地理志》《中国边海防志》编纂工作。武警部队积极推动第二轮武警志编修工作。《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完成全部11卷约1500万字的编纂任务，即将交付出版。

第二，年鉴工作快速健康发展。五年来，各地新创刊地

方综合年鉴400多种、专业年鉴200多种；上海、江苏分别出版《上海年鉴》《江苏年鉴》英文版。目前，全国地方志系统组织编纂的地方综合年鉴达1700余种，还有包括军事年鉴、武警年鉴在内的专业年鉴1200多种，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湖北、广东、海南、四川等省（直辖市）基本实现县级以上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全覆盖。

第三，旧志整理工作成绩斐然。五年来，全国地方志系统以点校、注释、影印、复印、扫描、原版复制等方式，整理旧志700多种，累计整理2000多种，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河南、四川等省（市）大规模集中整理旧志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抢救保护地方历史文献和加强全国古籍整理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四，方志理论和方志学学科建设迈出新步伐。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编写出版《中国

方志通鉴》《当代志书编纂教程》，启动并有序推进《方志百科全书》编纂工作，努力创建方志理论的概念体系和方志知识体系；积极开展对港澳台和对外学术交流，举办新方志编纂论坛，研讨交流方志理论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以《中国地方志》期刊为纽带，召开全国方志期刊工作座谈会，充分发挥方志期刊的理论阵地和引导作用。中国地方志学会建立学术年会制度，举办三届针对性较强、影响较大的学术年会，较好地发挥了学会的学术引领作用。学会城市区志专业委员会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推动城市区志理论研究。各地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地方志学会积极举办学术年会和理论研讨会，设立专项研究课题，组织优秀论文评选，编辑出版论文集，激励广大地方志工作者开展理论研究。五年来，全国地方志系统共发表方志论文6000多篇，出版专著、教材、论文集40余部。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召开《方志学学科建设规划》研讨会，与暨南大学合作举办方志学方向研究生进修班。复旦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宁波大学等高校继续招收培养方志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在地方志系统、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形成一支具有较

高理论水平的方志专家队伍。

第五，地方志系统设施设备信息化建设迈上新台阶。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全国地方志系统信息化建设经验交流会，设立信息化建设试点单位，实施中国地方志网、《中国地方志》期刊网、志书和年鉴数据库建设工程，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合作开展中国历代方志数字化工作。各地积极建设地情网站，五年来，新开通省级网站7个、市级网站80多个、县级网站200多个。目前，全国省级网站达到26个、市级网站近200个、县级网站470多个。许多地区加快地方志成果数字化速度，不断完善地情资源数据库，将海量电子资源上传到地情网站，供社会各界查阅使用。各级方志馆建设加速推进。五年来，国家方志馆建成，新建省级馆7个、市级馆20多个、县级馆80多个，一些地区的方志馆已获准立项或正在建设中。全军军事志馆建设在逐步推进中，中国武警史馆建成开馆。目前，全国已建成国家方志馆1个、省级馆15个、市级馆60多个、县级馆近200个。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千方百计丰富馆藏资源，并陆续向社会公众开放，展示地情、提供服务。

第六，地方志资源开发利

用开创新局面。各地地方志工作机构积极开展地情研究，编写地方简史和志书干部读本；创办资政刊物，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参与规划编制、旅游开发、招商引资、历史文化遗产发掘保护、防灾减灾等方面的工作，努力将地方志工作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利用地方志资料，编纂出版反映重大事件、历史名人、特色产业、重要物产等方面的地情资料和地情书籍，深度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方志·中国》已在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黄金时段播出，方志蓝皮书《中国方志文化发展报告》编写工作启动。各地与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等媒体合作，宣传地方历史文化和方志文化；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第七，地方志工作机构与队伍建设取得新成绩。领导小组办公室多次举办修志主编培训班和地方志工作机构新任负责人培训班，联合开展当代中国史和口述史专题培训。各地通过相互交流、出国出境考察学习、专题培训、举办讲座、与高校联合办学、以会代训等方式，对主编、总纂、编辑、组稿人员、撰稿人员等开展针对性强、内容丰富的业务培



训，努力改善队伍知识结构，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第八，地方志工作法治化建设深入推进。五年来，又有山西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修订了《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目前，全国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0多个市、县颁布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或政府规范性文件。有些部门和行业制定部门志、行业志编纂工作规定，人民解放军将《军事志工作条例》列入中央军委立法计划，武警部队出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史志工作规定》。河北等省（自治区）开展人大执法检查或政府督察，沈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等取得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强化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的权威性，有力地推动了地方志工作的健康开展。

二、地方志事业发展形势和奋斗目标

当前，地方志事业发展面临着大好形势与机遇，亟需乘势而上、顺势而为。

一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是进一步发展繁荣地方志事业的重要指导方针，为地方志事业发展确定了基调，提供了基本遵循。习

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今年2月25日，他在首都博物馆考察调研时强调“高度重视修史修志”，精准地概括了史书、方志等文献典籍的当代功用和千秋价值，明确了新时期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方向。

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构筑了广阔舞台。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形成的珍贵历史资料，需要我们及时搜集、整理和保存，重大事件和典型人物以及出现的新思路、新创造、新经验，需要我们及时发现、记录和宣传；另一方面，30多年来我们生产、积累的地方志成果和地情资料，翔实记录了前人和当代人的实践活动和智慧经验，可以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化改革提供智力支持，为各级领导干部了解熟悉地情提供咨询服务，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

三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政方针。地方志事业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和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

推动力量。地方志工作者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利用掌握丰富地情资料的独特资源优势，团结协作、群策群力，以更大的力度、更先进的手段，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多任务、发挥更大作用。

三、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

第一，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二，坚持把修志作为基本任务，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多、更优秀的方志文化成果。

第三，继续做好年鉴工作，真正使年鉴成为翔实可靠的年度地情文献。

第四，大力加强资料建设，夯实地方志事业发展和方志文化建设的基础。

第五，积极推进旧志整理工作，抢救保护好地方历史文献。

第六，加大对地方志工作基础设施的投入，更好地发挥地方志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第七，深入挖掘地方志资源，充分展示方志文化魅力。

第八，大力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方志学学科建设，努力扩大方志学在哲学社会科学

陈越良调研指导地方志工作

3月31日下午，省政府副秘书长陈越良专程到省志编委调研，听取了全省地方志工作情况介绍，翻阅、查看了有关史志资料和志编工作成果，实地调研了省方志馆，逐个办公室看望干部职工。

陈越良充分肯定了省志编委的工作。他说，地方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国史、省志、县志，对于记录历史、资治当下，具有重要意义、独特作用。四川史料众多，是全国方志大省，说明历史上战乱较少，承平较多，留下来的许多珍贵史料，对于我们正确定位省情、正确认识现状、正确做出决策，都殊为宝贵。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为地方志工作依法行政、依法修志提供了法规依据，省志编委的工作也很积极主动，注意沟通协调。修史写志是案头工作，默默无闻，清苦、辛苦，看起来是一本书，背后却有很多艰辛，需要很多付出。地方志工作意义重大，当前特别要注意一方面抓好修史写志，一方面注重读志用志，真正做到写好用活，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比如，今年是“改革年”，省委省政府强调“所有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史志部门可



陈越良(右二)调研省方志馆

以为此摘编一些有益、简短的史料，为改革提供史鉴和支持；可以多挖掘、整理一些地情资料，为社会服务，为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服务，进一步发挥助推发展第一要务的社会功用。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更需要文化底蕴和内涵来支撑，地方志在这方面可大有作为。

陈越良表示，对调研工作中提出的问题，将带回去向领导汇报，与有关部门协调，全力支持地方志工作健康、科学发展。

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汇报了工作。省志编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罗亚夫，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孝平及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四处等有关人员参加调研。

(邓瑜)

领域的影响。

第九，继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增强推动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十，深入推动地方志工作法治化进程，为地方志事业

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第十一，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组织保障。

第十二，努力做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工作，

确保地方志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摘编自作者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四川地方志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法制保障

□ 罗亚夫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经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正式出台，是我省地方志事业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必将推动我省地方志工作在以法律为依据、以史实为准绳的法制化轨道上加快发展、科学发展。

《条例》是新形势下推动地方志工作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依法治国”方略，王东明书记也强调“治蜀兴川重在厉行法治”。为实现“法治四川”目标，四川省于2014年1月9日颁布《四川省依法治省纲要》，确立了依法治省总体目标，要求将“治蜀兴川各项事业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地方志事业是“治蜀兴川”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志要实现依法行政、依法修志目标，就必须坚持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强化地方志工作，将其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以保障地方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而随着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施行和近年来我省社会经济和地方志事业不断发展，2003年颁布实施的《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已不能适应地方志工作需要：一是部分规定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二是地方志工作保障条件越来越高；三是社会经济发展对地方志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

修订完善后的《条例》，一是突出了制定依据：“依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条例”；明确了县级以上地方志书每20年编修一次，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与上位法对应。二是明确了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的法律地位和职能职责，为地方志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三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地方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第一次明确提出新设立

的县级以上行政区的地方志编纂工作规定；增设了古城、古迹拆迁和名称变更等事项的编纂规定；首次规定了方志馆的法律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志的开发利用和学科建设。《条例》还首次增加了对民族地区地方志工作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志编纂工作应当有当地少数民族人员参加。有条件的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志可以同时运用汉语言文字和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编纂。”强调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当遵守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规定，保障本地区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突出了四川省的多民族特色。

《条例》进一步体现了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统一，贯穿了以人为本、服务民生的理念，是我省地方志事业发展中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新形势下推动地方志工作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条例》为治蜀兴川地方志事业提供法制支撑

地方志是地方政府了解地

情、借鉴历史的施政依据，随着地方志事业的发展，通过方志馆、地情网等形式，地方志“资政”的功能不断被强化。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也是志书的价值所在。《条例》多策并举，从法律意义上保障了地方志编纂成果的质量，为治蜀兴川地方志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一是在内容上严把资料关、史实关、审核关，明确提出地方志的编纂内容和过程应当公开、广泛征求意见建议，请示有争议的重要事项；明确规定要“建立和完善地方志工作制度和业务规范”，加强对编纂人员的培训；明确部门志鉴、乡镇志鉴的法律地位；加强对部门志、行业志、专业志及年鉴的指导等，确保地方志编纂内容全面、真实、客观、准确。二是在体制机制上有创新和突破，采取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相结合、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相结合的办法，吸收各行各业的专家共同推动地方志工作顺利开展；赋予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征集地方志资料的权利。三是建立健全相应工作制度，进一步从法律上规范了地方志工作制度建

设，如建立志书编纂内容公开、意见征求和处理制度，健全志书评议制度、审查验收制度、奖惩制度等。

《条例》是促进地方志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法制保障

地方志工作要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要建立长效机制，实现依法修志。《条例》内容涉及地方志工作的方方面面，全面、系统、完整、实用性强，是我省地方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法制保障。

一是明确了责任。地方志是官修的地情书、国情书，修志是官职、官责。《条例》进一步明确了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的法律地位和职能职责；规范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在地方志工作中的责任；明确了地方志工作机构与承编单位的法律关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二是人财物得到有效凝聚。《条例》提出要把编修志书和年鉴工作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本级财政预算；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机构力量，抓好方志队伍建设，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保障工作

条件等，从法律政策高度，有效凝聚了开展地方志工作必需的人财物力，这既是加强当前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建立长效机制的根本之策。三是注重资源的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和后备人才的培养。《条例》提出要推动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强信息化建设和方志馆建设，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明确方志馆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资源共享原则；强调方志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的培养，使地方志事业保持旺盛生机和持久活力。

《条例》是推动我省地方志法治进程的尚方宝剑，是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依法行政、依法修志的行动指南，更是促进我省地方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法制保障。抓好《条例》的学习宣传贯彻、在全社会营造依法修志的良好氛围，是我省地方志系统坚定不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贯彻落实“依法治省”目标的重要途径，每位方志工作者应不遗余力为之努力。

（作者为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的法理解读

□ 刘应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省委书记王东明指出“治蜀兴川重在厉行法治”。在法治四川建设处于关键时刻的当前，正确理解和切实施行《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进一步提高我省修志工作法制化和规范化水平，促进地方志工作持续稳定发展。

一、从立法权限角度理解《条例》

《立法法》第六十四条对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限作出明确规定：（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从我国立法体系看，《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制定必须符合《立法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条例》修订说明讲到，近年来我省社会经济和地方志事业不断发展，2003年颁布实施的《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已不能适应地方志工作需要，亟待修订完善。修订后的《条例》共26条，增加了13条。修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应上位法的修订；二是进一步明确地方志工作机构职能职责；三是完善地方志工作程序；四是进一步规范地方志服务功能。《条例》的修订内容切实遵从了《立法法》的规定。

第一，《条例》与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中相应条款的规定完全一致。如《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

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与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完全一致。第二，《条例》中的部分条款是为执行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规定所作出的具体规定。如《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审查验收制度，具体化了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二条“对地方志书进行审查验收”的要求。第三，《条例》中的部分条款是对地方性事务进行的规定。如《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志编纂工作应当有当地少数民族人员参加”，是针对我省有民族自治地方的情况所作的规定。第四，《条例》中的部分条款是对上位法尚未规定的事项，根据实际需要，先行作出的规定。如《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建立志书评议制度”。纵观整个《条例》，没有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条款，适应地方志工作需要，并进行了大量创新探索。

尤其是修订中删除了“在地方志编纂中，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拒绝提供有关资料或者提

供虚假资料的，由同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地方志工作机构提请同级人民政府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这一规定超越了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规定，与上位法相抵触。对其删除切实体现了对上位法的遵从。

二、从法的要素角度理解《条例》

法是由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法规三要素组成。《条例》亦如此。

法律概念是在法律上对各种事实进行概括，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法律法规常常需要对其中容易引起歧义或者专业性的用语进行解释定义。由于我国的修志历史源远流长，地方志工作中的绝大多数专业性用语已成为共识，不会引起歧义，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又对“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等专业性用语作出了解释，因此，《条例》没有解释其中涉及的诸多专业性用语，仅在第二十条第一款从功能角度对“方志馆”进行了定义，规定了方志馆的职能职责。

法律原则是众多法律法规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和稳定

性的原则和准则。法律原则虽然不预先设定任何确定而具体的事实状态，也不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但是它在法律实施中，具有指导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补充法律漏洞和强化法律调控能力、限定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范围等重要作用。《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即是法律原则：“地方志编纂工作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客观、系统、科学地反映当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及现状。”对地方志书反映当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及现状强调了“系统”性要求。

法律规则是构成法律最基本、最主要的要素。法律规则是指具体规定人们权利和义务并设置相应的法律后果的行为准则。按照“三要素说”，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为假定、处理和法律后果三部分。法律规则不同于法律条文，法律条文只是法律规则的表述形式，在表述法律规则时，通常加上“可以”“应当”“不得”等情态动词。《条例》的第四条至第二十五条共22个条文，均属于法律规则的表述。

三、从规则适用角度理解《条例》

施行法律法规的实质是在

理解法律概念的基础上，在法律原则的指导下，正确地适用法律规则。

《条例》是我国地方志工作法规体系中的一部法规，不能孤立地理解《条例》的施行。施行《条例》必须与施行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相结合。

《条例》属于行政法，必须从我国行政法中“法律规则”特点的角度理解《条例》的施行。在我国的立法中，尤其是行政法律法规中，存在着大量只规定某一种权力或者某一项义务，而不具体规定该权力被滥用或该项义务得不到遵守时应承担什么法律后果的法律规则。对这样的法律规则，常常只能通过其他措施或方式对遵守规则或者违反规则的行为予以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条例》中有诸多这样的法律规则。

《条例》的施行要在通过广泛宣传形成全社会自觉遵守氛围的基础上，结合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根据我国行政法的特点，分类适用《条例》中的法律规则。

一是通过追究法律责任的方式施行《条例》。违反它则带来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在



《条例》中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是《条例》同时规定了否定性法律后果的情形。《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省地方志工作总体规划内的省、市、县三级志书，公开出版发行的实行审查验收制度。”第二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审查验收、批准将地方志文稿交付出版，或者地方志存在违反宪法、法律、法规规定内容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本级人民政府责令采取相应措施予以纠正，并视情况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这条规则是通过追究行政责任的方式加以适用。

第二种是在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中规定了否定性法律后果的情形。《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地方志编纂过程中收集到的文字、图表、照片……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或者出租、出让、转借。”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由其所在单位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分。”这条规则也是通过追究行政责任的方式加以适用。

第三种是显而易见其否定性法律后果的情形。《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方志馆应当免费向公众开放，并将服

务范围、开放时间等服务事项进行公告。”虽然没有规定法律后果，但其法律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方志馆在向社开放中收取费用，由此而引起诉讼，方志馆承担败诉责任。

二是通过工作督促考核的方式施行《条例》。《条例》中涉及多项法律规则，没有法律后果的规定，对其只能通过指导检查、表彰奖励、通报批评等督促考核的方式加以适用。

督促考核的对象包括政府、部门、相关单位和个人。如根据《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将地方志事业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则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为督促考核的对象。

督促考核的内容既可以是综合性的，也可以是单项性的。如根据《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可以对地方志工作信息化建设成效进行单项考核。

督促考核的评价方式分为两类。“可以”表明是授权性法律规则，“应当”表明是义务性法律规则。

第一类，《条例》条文中情态动词为“可以”，督促

考核的评价方式只能“奖”，不能“惩”。如《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有条件的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志可以同时运用汉语言文字和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编纂。”如果某个民族自治地方没有执行该规定，因此而受到批评或者考核扣分，是不应该的。

第二类，《条例》条文中情态动词为“应当”，督促考核的评价方式既可“奖”，也可“惩”。如《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编纂部门志、行业志、专业志和年鉴，应当接受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的指导”。如果某单位在编纂部门志时，主动接受指导，则可对之表扬，不接受指导，则可对之批评。

三是通过鼓励和支持的方式施行《条例》。《条例》中有三个条款的动词是“鼓励和支持”，这三个条款表明了《条例》的法律价值取向，对社会起着引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的方式灵活多样，比如宣传引导、知识讲授、信息提供、经济补偿、表扬颁证、创造机会等均属于“鼓励和支持”。

（作者单位：四川巴中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实事求是地对待市县志书的篇幅问题

——以《绍兴县志》《海盐县志稿》等为例

□ 颜越虎

自首轮修志以来，市县志书的篇幅问题一直是方志界的热门话题，多数人认为市县志书篇幅过长，应该控制志书篇幅。但笔者认为，一味笼统地提控制志书篇幅会给强化志书资料性、提高志书使用价值、巩固志书独特地位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

一、实事求是看待市县志书篇幅长短的得失

总结首轮修志，设置许多禁区无疑是值得反思的教训，而篇幅上的规定当是其中之一。

如《象山县志》，分为6个部分，50章，书末设附录。全志57万字，被誉为“相当精炼、极有特色”。^①但其最大不足就在于资料性不足。资料性是地方志的第一属性。志书的资料需要广泛收集、认真考订、精心提炼。虽然篇幅与资料性不能划等号，但资料性需要一定的篇幅来保证。《象山县志》原稿有200多万字，定稿时根据有关规定，删节到50万字左右，正是篇幅太短，才导致志书的资料性不足。

另一部志书是《绍兴县志》。上世纪90年代初，《绍兴县志》启动编纂时，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绍兴县志》顾

问陈桥驿先生即认为，绍兴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经济繁荣，可以入志的内容很多，修《绍兴县志》，有多少内容就确定多大篇幅，不必拘泥于“三十万至五十万左右”的框框。事实证明，陈桥驿先生这一关于志书篇幅确定的指导思想非常正确，对强化《绍兴县志》的资料性，保证其质量起到关键性的引导作用。400多万字的《绍兴县志》，是首轮修志中篇幅最大的县级志书之一，也是以足够篇幅保证志书资料性的一个成功范例。

从以上两志有关医疗卫生部分的记述可见其相同内容在文字量上的悬殊差异。前者共8930余字，后者共45570余字。下面再摘录其中的几条来作一比较，分析两部志书的资料性。

“外科”条：《象山县志》第553页记载：“外科，能做肝、胆、胃、肠、甲状腺、颅脑、泌尿及骨科等手术。”《绍兴县志》第1701页记载：“外科 民国元年（1912），绍兴基督教医院始设外科，并施行下腹部手术。七年，绍兴病院首次施行截肢手术。30年代，绍兴福康医院创设手术室，时称割症室，对3例脓胸患者施行胸廓成形术。40年代，施行胃肠吻合术及膈神经

压榨术。建国后，先后施行胃次全切除术、十二指肠总胆管吻合术、胰腺癌根除术成功。1954年，第二医院首次应用赛璐珞球（乒乓球）胸膜外或骨膜外填充治疗肺结核、肺切除治疗肺肿瘤。1959年，该院施行左肝切除术，应用瓣膜扩张器进行心脏二尖瓣分离手术及在低温麻醉下血管吻合术治疗法乐氏三联症。1962年，设肿瘤专科及肿瘤病房。1966年，设泌尿外科。80年代起，应用MTC—1型微波施用器治疗肝癌，开展门脉高压H搭桥术、常温下血流阻断右半肝规则切除术、直肠癌腹骶手术保留肛门括约肌术、股血管自体血管移植修复术等。1990年后，先后施行先天性心脏病（室缺）体外循环直视手术、巨大脑膜瘤摘除、左肾上腺皮质瘤根治术及脑外科手术。”

前者仅29字（含标点符号，下同），后者410字。什么时候设立外科，什么时候开始能做什么手术，哪家医院能做这些手术，这些手术包括哪些具体项目，从前者的记述中读者无从知晓，从后者的记述中则可以了解得比较清楚。

其实，以足够篇幅保证志书资料性的情况以往也不鲜见。最著名的当属民国《鄞县

通志》。该志共36册，51编，约550万字，分为舆地、政教、博物、文献、食货、工程等6志，并附地图一函，计26幅。陈桥驿先生曾指出：“此志不仅篇幅浩大，资料完备，而且内容新颖，称得上是地方志步入现代科学的嚆矢。”^②该志在北美、日本等地极受推崇，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认为他在斯坦福大学建立宁绍研究室，除了这个地区在中国的重要性以外，十分有利的条件是这里的雄厚资料基础，而其中特别令他鼓舞的是民国《鄞县通志》。他认为这是中国地方志中的杰作，使他大大增加了对宁波近代城市发展及其进行深入研究的热情和信心。”^③日本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在他的巨著《宋代江南经济史之研究》的后编《宁绍亚地域之经济景况》中，特别设立《宋以后之宁波》一章，其中论述宁波的经济概况、都市组织、职业组织与文化、都市不动产、课税与管理、宗教与都市生活、以宁波为核心的商业组织等文后注释频频引用《鄞县通志》，该志价值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之所以认为“这样的方志才能使研究者左右逢源，才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④，就是因为《鄞县通志》极强的资料性。

既然民国时期的县志可以达到500多万字的篇幅，那么，今天我们编纂县级志书也完全可以达到甚至超过这样的篇幅，关键就看有没有资料性。

二、实事求是看待市县志

书编纂者在处理志书资料性与篇幅关系方面所做的努力^⑤

以《海盐县志(1986-2005)》的编纂为例，该志稿经过反复修改，其终审稿设置专志49卷，志首设总述和大事记，志末设附录，总字数约278万字。专志采用暗分部类的办法，分为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镇概况6个部分。

在修志过程中，海盐县史志办十分注重志书的资料性，强调对有存史价值的资料搜集齐全，记述厚实。一是事物的基本要素力求记完整；二是宏观性要项内容、重点资料多作保存，如经济部类中凡反映一地宏观整体经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内容的资料尽量收集齐全；三是有时代、地方、专业特色的事物尽可能浓墨重彩；四是基本统计数据尽可能20年不缺，并在主要统计表格后注明资料出处和统计口径，以保证资料的存史价值和使用价值。为强化志书的资料性，海盐县史志办非常注重做好资料长编，这是提高资料的可信度、保证志书质量的一个有效举措。资料长编既是志书编纂的基础、考证的依据，又是比志书更全面、更具原始性和资料性的完整的资料汇辑，资料长编编辑到位，修志进度就较快，初稿质量也较高。即使后期有的篇目进行较大调整，资料也基本够用。相反，资料长编编辑不到位的单位，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反复，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质量不高，遗漏较

多。一旦篇目有所调整，工作量就更大。由此可见，在修志工作中，必须抓好资料长编的编辑工作，才能为强化志书的资料性、提高志书质量打好坚实基础。

海盐县史志办建立了评稿组，对经过编辑修改后形成的志稿逐卷进行内部评审，反复删削字数，锤炼打磨文字，以提高志稿的质量。在此基础上，形成370.53万字（不含随文照片）的初审稿。初审之后，根据专家的意见进行修改，形成319万字的复审稿（不含随文照片）。复审之后，又作了较大的缩减修改，形成278万字的终审稿（含随文照片）。如第十三编“农业”，初审稿中有15万余字，共9章44节，其中对水稻、油菜、棉花等作物均设节记述，下设“品种”“栽培技术”“施肥技术”“病虫害防治”“规模经营”等条目，既占篇幅，又没有地方特色。在形成复审稿时，编辑人员对该编做了较大规模压缩，水稻、油菜、棉花等由节降为目，对具有共性的内容，记述时点到为止，文字量压缩近一半；其次是对不同编的同一内容记述采取详略互见等办法，在略写处注明详见处，有的甚至删节。

从初审稿到终审稿，志稿文字量减少了100多万，编纂者们每删一字，都在为既减少志书篇幅又突出志书资料性而煞费苦心，都在为提高志书的质量呕心沥血。

三、实事求是看待志书篇幅与志书利用的关系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志书篇幅加大，……但却妨碍了志书的阅读使用”^⑥。

这牵涉到志书篇幅与志书利用的关系问题。修志为用是地方志编纂的根本目的，但怎么用却是很有讲究的。我们知道一部方志，极少会有读者从头至尾去“卒读”，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阅读其中的某些部分，查找有关资料。而像施坚雅、斯波义信等人，作为中国地方志的大用户，即使如《鄞县通志》这样的大部头志书，也会反复查阅，甚至反复“卒读”，只要资料性强，志书的篇幅再大，也丝毫不会影响其阅读和使用的兴趣。至于领导干部阅读志书，关注的也应该是志书的内容，只要真正是工作需要，他也一定会挤时间去看、去查，而不会在乎志书篇幅的长短。

四、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市县志书的篇幅

王铸人在《论说书籍篇幅的长与短》中指出：“人们著书立说，作诗撰文，应当根据内容的需要，宜长则长，宜短则短，这是顺理成章的。图书和文章不是越长越好，当然也不是越短越好。”^⑦

志书也一样，不同的市县可记的内容多寡不一，志书篇幅长短不同，如果规定字数，就显得不切实际；一味笼统地强调大力控制志书篇幅，会在很大程度上束缚志书编纂者尤其是主编们的手脚。

在论述志书篇幅的一些文

章中，常常有人提及胡乔木同志要求编志书应像打电报一样，以此作为重要的论据。其实这一引用，没有全面反映胡乔木的有关要求。胡乔木曾经指出：“地方志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料。在这个范围内，应该要求地方志做到一句也不多，一句也不少。如果说不能做到后一点，至少要做到前一点。”“地方志应做到详细，同时也应做到简略。所谓详细，指它所应讲到的方面都讲了；所谓简略，就是指每个方面的说明要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的精炼，要惜墨如金。作为一部实用性的文献，不能分量太大，分量太大引起种种不便，这是一种希望，一种既不容易达到而又必须达到的奋斗目标。”^⑧从上面这两段话中可以看到，胡乔木首先强调的是志书要“提供科学的资料”，然后要求“在这个范围内”考虑志书的篇幅；在篇幅与资料性的关系上，他更强调的是“多”，而不是“少”，特别要求在做不到“多”（即“一句也不少”）的情况下，至少做到“少”（即“一句也不多”）；他首先要求“详细”，然后要求“简略”，这仍然是在强调志书的资料性。志书要做到既有很强的资料性，又篇幅适当，才是最理想的。

志书的篇幅是表象问题，表象背后的实质是资料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了资料性，志书再简短，也没有意义。如韩邦靖编纂的《朝邑县志》文采焕然，被收入《四库全书》，是明代方志“尚简派”

代表作之一，但全志不到6000字，内容极其单薄。且不论其资料的可靠性，仅从记述的角度上讲，《朝邑县志》失之太简，“这样的志书又有何价值呢？这样的‘简’又有何可称颂之处呢？”^⑨。

注：

①林志龙：《方志体例回眸》，《学诚斋集》，2005年内部分行，第255页。

②陈桥驿：《民国〈鄞县通志〉与国外汉学家的研究》，《陈桥驿方志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3页。

③④同上，第245—246页。

⑤本部分内容参考、引用了海盐县史志办公室提供的《以二轮修志试点为契机，扎实推进〈海盐县志（1986—2005）〉编纂工作》一文和马建中、王健飞、姚虎良等先生提供的有关资料。

⑥陈泽泓：《控制篇幅与续志创新的思考》，《中国地方志》2001年第5期。

⑦王铸人：《论说书籍篇幅的长与短》，《编辑之友》1992年第5期。

⑧胡乔木：《在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献选编》第120—121页。

⑨刁方圆：《〈武功县志〉与〈朝邑县志〉述评》，《陕西史志》2004年第1期。

（作者单位：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加强志书卷首地图设置编纂研究

□ 沈永清

【内容摘要】图是组成方志的体裁之一。清代、民国志书传承图经体例，卷首设置图说、图目、绘图，一邑之眉皆收眼底。首轮修志地图设置逊于清代、民国志书，第二轮修志又逊于首轮志书。据此，第二轮修志者应加强对卷首地图设置编纂研究，以利提升志书地图质量。

【关键词】方志 地图 解读 研讨

一、图是组成方志的体裁之一

“方志从产生到形成成为一种特定体裁的著作，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图与方志有着渊源相缘的关系。方志从它出现之日，就与图结下了不解之缘。不少学者认为图是方志的鼻祖：方志由图演变而来。无图不成书，有志必有图，早已成为定则。最早的方志是以图为主题，用图表示一州一县土地物产等，而附之以必要的文字说明，这些图在方志中称之为‘图象’‘图说’‘图谱’‘舆图’‘图例’等等。随着文字说明越到后来越多，图的部分虽退居于附录，但仍冠于编首。图很少单独立卷，有的根据内容，插入有关章节。作为方志的重要体裁形式，图在方志里起着文字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早期周官所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还是明清时期地方志，无不惟图是赖。利用图对客观事物进行描述和解

释，并向人们提供某一地区的整体形象和其他各方面的明确信息，是中国方志的一个特色。”^①

新方志的“图”既包括各类地图、手工绘画、摄影照片，也包括由统计表转化成的统计图、示意图、几何图，其中以照片为主要形式。文本中的图是专指各类地图（地图示意图），地图在方志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地图与文字紧密结合，互为补充，使所序之事一目了然；用地图反映文字不易表达清楚或无法表达的内容，以加强方志内容的表达；图文并茂，有利于加深读者对文字内容的印象。

清史学家章学诚在《和州志·舆地图序例》中提到：“图之有类别，犹书之有篇名也。”“今州志分图为四：一曰舆地，二曰建置，三曰营汛，四曰水利。”^②之所以选取这些题材，无非是与重要领域的自然、政治、军事、农业有关。

民国时期志书对图更为重视。1929年颁发的《内政部咨发修志事例概要》规定共22条，其中有关图和照片的规定就有5条。《概要》对入志种类和绘图技术提出要求：“各省志书，除每县市应有一行政区域分图外，并须将山脉、水道、交通、地质、物产分布、雨季分配、雨量变差、气候变差以及繁盛街市、港湾形势、名胜地方，分别制绘专图，编入汇订”“旧志舆图，多不精确，本届志书舆图，应由专门人员，以最新科学方法制绘精印，订列专册，以裨实用”“编绘分省分县市舆图时，对于国界、省界、县市界变迁沿革，均应特加注意，清晰划分，并加附说明，以正疆界而资稽考”“地方名胜古迹，金石拓片，以及公家私家所藏各种文物，在历史上有重要的价值者，均应摄制影片编入，以存真迹”“各地方重要及特殊方物，均应将原物摄制影片编入，并加以说明，以资考

证。”^③

相比之下，新方志对图与照片的重视及规范要求似未达到应有的程度。中指组制定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和《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明确图是志书体裁之一，但只提出“图表可分别附在各类之中。图表尽量采用现代技术编制”。并未引起第二轮修志者的关注。

二、卷首地图编纂

(一) 位置图（定位图）与全境图（首图）

位置图与全境图在志书地图编纂中有待方志界实践和研究。

所谓位置图与全境图，笔者认为就是学界所说的定位图与首图。本文所说的定位图，“是指标明志书所记的某省、市、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所处的地理位置图。……县志用来确定该县在中国及其所属省内的地理位置图，称为某县志的定位图。所谓首图应该是志书的志首开页所设的表明某省、市、县总体情况的综合性地图。比如县志，由于它是记载该县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作，那么作为县志的首图，就是能综合反映该县自然、政治、经济一般特征的地图。它应向读者展示该县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行政区划、城镇村庄、山脉河流、水陆交通、毗邻接壤等自然和社会现状，同时又不把任何一个要素予以过分突出。首图所展示的情况虽然是简略、粗线条的，但却开宗明

义，从一开始就给读者一个总的形象概念，为志书各部分的展开做好必要的铺垫。”^④

对于一部志书来说，定位图和首图是必不可少、缺一不可的，有定位图无首图，只知其位置而不知其详，有首图无定位图，那就只知其详而不知其位置。

例，新编《川沙县志》卷首所设的“川沙县位置图”，为川沙县的地理位置方位作出准确的定位。《金山县续志（1986—1997）》卷首所设的“金山县全境图”，将金山县全境基本面貌尽收眼底。这两部县志可为第二轮志书编纂定位图与首图提供借鉴。

定位图与首图应置于志书卷首地图照片集之首，分列第一、二幅。“普通地图是综合反映地面上自然和政治、经济一般特征的地图，它所含的要素多，用途广；而专门地图，则是‘着重表示自然和社会现象某一种或某几种要素的地图。一般分为：自然地理图（如气候图、水文图、地质图、土壤图、植被图等）、社会经济图（如经济地图、政区地图、人口分布图）和历史地图等。’显然政区图是专门地图的一种，它‘着重表示行政区划状况，行政中心所在，以及交通线等’。而作为志书的首图所含的内容比这要丰富得多，它不仅应有行政区划的内容，而且还应标有资源状况、农林牧场、水陆交通、河流湖泊沼泽、桥涵、山峰、电站、温泉、古迹等内容。由此可

见，作为专门地图的行政区划图是承担不起志书首图的重任的，作为首图应当采取普通地图。”^⑤

(二) 政区图与以经济为主的综合性地图

首图后是政区图，反映不同地区的行政区划。行政单位的面积分布用质底法表示，政治行政中心用圈形符号表示，政治行政境界用线状符号表示。需要表示的要素还有居民地、水系和交通线。其他地理要素，如地势、土质、植被等则简略表示或不表示。《青浦县志（1985—2000）》卷首“1999年版青浦县行政图”，可为第二轮修志借鉴。

政区图后应是一幅“以记人文为主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于一炉的综合图，主要载志书中所记述的重要设施、建筑物、骨干企业、交通要津、名胜古迹及其经济区、开发区之类，列在行政区划图之后。”^⑥

(三) 其他地图

1. 地质图。表示地壳表层的地址构造、成因、底层年代、岩石分布、火山、矿藏储量等地质现象的地图。不同时代的底层应按照地质统一规定的色谱和各种代表地层年代的符号绘制。水系一般不简化，居民地及其他要素仅表示主要的或与地质有关的内容。

2. 人口图。包括人口分布、人口密度、民族、迁移及人口增减图，用点值法表示，每点代表一定数量的人口，点的密度反映人口分布的疏密。

3.土壤图。表示出各类土壤的分布。用质底法表示出不同的土类、亚类及土种机械组成和成土母质的成份(粘土、壤土、砂土、砾质土用晕纹符号表示),土壤组合和小面积土壤可用非比例符号表示。

4.水文图。表示出地表水的分配、动态、成分和性质的数量指标。径流量是最重要的水文要素。通常用径流深度(毫米)表示,也可以用径流模数(升/秒/平方公里)表示。

5.地貌图。显示地表形态的数量指标、地貌成因、年龄及其发展过程。按成因、年龄、现代发育强度划分不同地貌类型,可以用不同颜色和晕线加以区分。微型地貌和一些中型地貌形态,各采用不同形状、大小和颜色的符号加以区分。一般符号的大小表示数量的差别,形态和颜色表示质量的差别。在地貌图上要详细地表示岸线和水系,居民地只表示主要的,其他要素可简略或不表示。

6.气候图。反映出大气层中各种气候要素和物理现象的分布、结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可编成气温、气压、降水量、蒸发量、气候区划等图。气候图多以等值线来表示。气流线、风向、风力、冰雹路径等常用箭形符号表示。箭形符号的粗细表示风向的速度和强度,长短表示稳定性。首尾相接的箭形符号表示运动的路线。

7.植被图。表示出各种植被或植物群落的分布。各种植被分类单位在地图上能综合反

映出自然地理条件的特征、分布情况。它和地形图、地势图、土壤图及其他地图有密切联系。

有关经济(农业、工业、商贸、金融)、文化(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公用事业、文物胜迹等分布图设置,应地情而异,或置卷首或随文当可灵活处置。

三、综述

地图,包括位置图(定位图)、全境图(首图)和专业地图。其特点在于能展示本地地区的宏观情况于咫尺之间,使人一目了然,有较强的资政、存史作用。首轮和第二轮已出版志书都有适量地图,但笔者感觉还有以下缺憾:一是卷首地图单一,往往只有行政区划图,难见地形地貌图、交通图、气候图、物产图、矿产图、水文图、降水图等;二是首轮志书大多是通志,卷首的行政区划图,多只为当下之区划内容,不见历史沿革,难以厘清脉络;三是已有的地图上缺失辅助要素,如图例、图号、时间、地图来源等。现在正值第二轮志书编修正盛时,编纂者应从旧志、新志的用图中,得到一些借鉴,以使第二轮志书日臻完善。

首先,在篇目设计时,就应对本部志书的地图作出规划。卷首必有位置图(定位图)、全境图(首图)、行政区划图、经济综合性图、地势图、地质图、人口图、土壤图、气候图、植被图等,再按

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等部类进行深层次设计,以突出该类事物需反映的重点。设置随文地图,图为志设。

其次,要深化志书所记内容,才能做好图的编绘。志书中图与志是相互呼应的,如果没有相应的内容记述,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失去价值,或形成文不对图的现象。

第三,要取得测绘部门的帮助,拿到各类专业地图绘制所需的底图,对于那些地理要素复杂或需要通过专业的测绘手段才能绘制的地图,更应像民国编纂志书所要求的那样,请专业人员以科学的方法绘制精印。

注:

①刘克明:《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图学成就》,《中国地方志》1992年第2期。

②章学诚:《和州志·舆地图序例》,转引自高国抗选注《章学诚方志论文选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③《内政部咨发修志事例概要》,载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选编《中国方志文献选编》,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5页。

④⑤赫永清:《定位图和首图的设置及作用》,《中国地方志》1993年第5期。

⑥张一平、顾良生:《新方志应置以经济为主的综合性地图》,《中国地方志》1988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上海市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

方志资料与马克思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研究

□ 陶利辉

方志作为集存信息的文字载体，不仅在中国有丰富而完整的发展体系，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进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反映民族民风的文化典籍在体裁表现方面既有历史学的特征，同时也有方志特别是方志体系中的民族志的特征。比如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日尔曼尼亚志》(塔西陀著)、成书于19世纪后期的《古代社会》(摩尔根著)以及《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原因、进程和结果》(科瓦列夫斯基著)等。这些著作，有着明显的民族志特征，比较清晰地为人了解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区域内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状况提供了便利，在有关社会发展形态的研究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进程中，方志资料展现了独特的魅力，发挥了重要的实证作用。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缘起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来的，

“亚细亚”这个名目的提出，应该与反对巴枯宁等人试图把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和共产主义等同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行径有关。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从事公社所有制的研究时，就注意到俄罗斯的公社所有制问题。1852年3月18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研究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学和社会制度的重要性。他指出：“把古代斯拉夫主义和把俄罗斯农民描绘成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是“陈旧的泛斯拉夫主义的骗人鬼话。”^①

俄罗斯的农民公社所有制是由一位普鲁士官员哈克斯特豪森于1845年在俄国发现的，他把自己看到的共耕均分的所有制当着一种十分奇妙的东西向外大肆吹嘘。巴枯宁等人辗转得到这套理论，便利用它来作为政治宣传的资本。

由于当时私有制思想占领人们的头脑已有上千年，一旦这种原始的共产主义残余被发现，再加上西欧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而共产主义理论又处于草创阶段，所以它就很容易地被当作一种理想模式。于是这种原始的、比私有制落后的农民公社的共产主义便被一些

人说成是比资本主义先进、高级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才能取得的现代共产主义。

在巴枯宁等人看来，以俄国的农民公社所有制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不需要经过许多应该经过的历史阶段，不要经过文明，不要资产阶级，也不要无产阶级，可以一步登天，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和人类社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的规律是背道而驰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花了很多精力与之论争，他们大约从1853年起，就比较具体地、多方面地、长期地研究农村公社所有制问题直到他们的晚年。^②

他们一开始就研究公社所有制，研究克兰和氏族，注意到苏格兰的盖尔人的克兰和古代亚细亚人的氏族公社。^③他们投入极大的精力研究亚细亚、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所据资料基本上是当时英国在印度殖民地当局提供反映印度当地民族生产生活的民族志资料，这些资料尽管存在很多局限性，所论证的主要也只是公社所有制的残余部分。但由于当时资料比较稀罕，这些反映公社所有制残存的资料也都十分珍贵和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公社所有制资料，在当时

相形之下较多而具体的，除了俄罗斯的和亚细亚或印度的以外，还有爱尔兰的、日尔曼的等等。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经过多年对民族志资料的收集探讨，公社所有制的基本情况已为马克思、恩格斯基本掌握。马克思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有关手稿中，也涉及到所有制问题、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包括公社所有制问题。^④1858—1859年间，在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后，马克思终于选定“东方”“亚细亚”或“印度”等名目，在《导言》中提到“东方社会”，在《序言》中用上“亚细亚生产方式”。

马克思批驳那些吹嘘俄国农民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的观点，“近来流传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⑤可是，这种原始公社（农村公社）是一切文明民族在其历史初期所共有，在罗马人、日尔曼人、赛尔特人中有，在印度人中也。

1868年3月14日，当马克思谈到毛勒关于日尔曼人公社所有制的资料时，他写信给恩格斯，对巴枯宁等人的错误说法又作了批判：“我提出的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在这里……再次得到了证实。这样，俄国人甚至在这方面要标榜其独创性的权利也彻底丧失了。”^⑥

1870年3月27日，马克思在致维希·库格曼的信中明确

指出：“公社所有制起源于印度，并且说它在欧洲各文明国家的发展初期都可以看到。”^⑦

不久之后，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土地公社所有制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印欧民族人民低级发展阶段上都可以看到，指出马来人的公社所有制也是受印度的影响而存在的。^⑧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加注中，还作过这样的论述：“土地公有制的村社乃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⑨

起源于印度之说尽管在后来的研究中表明是错误的，但在当时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种见解是实事求是的，否定了只有俄国才有公有制的农村公社的错误论调。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实质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从马克思利用民族志资料的多处实证来看，“亚细亚生产方式”更多地贴近农村公社的经济形态，内容并不包涵农村公社之上的专制主义。马克思在论述“亚细亚所有制”一节里作了比较明确的说明。“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势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众的土地财产而存在。”“这种部落的或公社的财产大部分是在小公社范围内，通过工业和

农业的结合而生产出的。因此，这样的公社是完全独立的，它本身具备有生产和再生产的一切条件。”“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势的前提，即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

虽然马克思也曾经多次提到过专制政体问题，但马克思所言的专制政体总是凌驾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些小共同体之上，或者说是建立在残存于阶级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即农村公社之上。而在另外一些著作中，恩格斯也说：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⑩

“亚细亚生产方式”即农村公社的内容我们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还可以得到证实。“太古的狭小的印度共同体，一部分还继续存留到现在，这种社会的基础是土地共有，农业与手工业的直接结合，固定的分工。”马克思描述印度村社时也这样说：“目前还部分地保持着的原始的规模小的印度公社就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农业与手工业直接结合以及固定分工之上的，这种分工在组成新公社时成为现成的计划的略图。”^⑪

那么，那些太古的狭小共同体，那些旧的原始公社是不是农村公社呢？首先，马克思

在民族志资料中看到的印度村社只是印度封建制下的残余,即使他们还保存一些相对原始的东西,也只不过是原始的农村公社而不是农村公社之前的具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公社。其次,马克思一直认为亚洲的(包括印度在内)公社不是血缘公社,起码不是纯血缘的公社。1853年1月,马克思研究了还在上升为像苏格兰氏族那样的社会形态的氏族社会解体后断定,它与俄国公社和亚洲公社也有共同点,即“土地都是氏族的财产,在氏族内部,尽管有血缘关系,但是人们之间也有地位上的差别,正像所有古代亚洲的氏族公社一样”。^⑩马克思这里所言的氏族公社实际上是农村公社。

由此我们看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容是原始的农村公社的基本内容,由于马克思在论及相关问题时,把蜕变后的农村公社的各种形式,诸如专制政体等一并作了论述,使学术界产生了一些误解。

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扬弃

客观地分析“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的历史背景,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是在充分利用民族志资料,在批判巴枯宁等人的谬论中致力于人类社会初期社会形态研究的。他在探索“所有制的最初意义”^⑪过程中发现“公有制是原始形式”。^⑫恩格斯在1887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注解中说到:“在1847年,社会的史

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哑谜。”^⑬后来,马克思在研究印度社会中发现了农村公社内部的一些公有制现象,他意图通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一方面回击巴枯宁等人的谬论,另一方面推出原始公有制的各种形式。他断言,从这些农村公社内部一定能推出某种原始的形式,“仔细地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原始公社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实际上囿于当时的资料限制,马克思这一构想,进展得并不顺利。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随着各地民族志资料的不断发现,特别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科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原因、进程和结果》以及拉法格的《财产及其起源》等书的出版,书中大量集存的民族志资料,极大地丰富了史前史研究的内容,使农村公社以前的公有制的各种形式从推理步入了实证阶段。而作为代指农村公社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由于不再具有普遍性的代表意义而被马克思放弃了。^⑭

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37-3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494页;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434-43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571-57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上。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2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4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63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61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66页。

⑩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选集》第三卷220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95-396页。

⑫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57页。

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三分册113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12月第一版。

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97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一版。

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页。

⑯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研究,宋蜀华先生、祁祁富先生从民族学的角度有过系统的研究。本文中的许多观点甚至论断不少出自两位老师的著作和文章中。

(作者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浅谈部门志的编纂

□ 龙祥云

部门志，是记述该部门各方面历史和现状的综合资料性著述。部门志可以全面记述并反映一个部门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可用于部门干部熟悉情况，掌握规律，改善管理，谋求事业发展；也为研究地方历史与经济发展、为部门领导的决策提供资料依据。部门志具有详实、具体、细化、微观的特性，具有独立存在的研究价值。

一、部门志的体例

志书的体例就是志书的体裁和凡例。主要包括三个要点：结构、体裁、语言章法。

部门志在制订编纂方案时，首先要确定断限问题。为了记载的连续性，反映历史全貌，个别事物可上溯到开端或事业兴起之时，但志书所载内容的下限必须统一，切不可参差不齐。

志书的体裁有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述即概述。把对本部门历史与现状的完整认识，用简明扼要的文字，概括地纵述本志所述范围的历史发展之大势，横陈现状的最基本情况。记即大事记。用编年体（按年、月、日编排史实）和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过程）相结合的办法，逐条记述本部门所发

生的大事、要事。志的含义即记载，也就是志书的正文。传即人物传。图是指地图、照片、统计图。表是以简驭繁记述历史的一种体裁，包括人物表、各种统计表。录是附录，辑录一些重要文献以及其他有保存价值的资料。

志书的章法，一是指志书的结构法，即编排规范。包括志书的基本框架、结合方式及层次安排。二是指志书的编写要求，包括编纂的基本原则和撰写方法。编修志书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据事直书、述而不论”，寓褒贬于事实的记述之中，偶有议论只能是画龙点睛之笔；“横不缺项、纵不断限”；“详今略古”或“详近略远”；“生不立传”“以事叙人”“越境不书”等。志书的编排撰写方法是：以类系事、横排纵述、以横为主、先横后纵、纵横结合。“横”是指按事物的统属关系从横向上逐层剖写；“纵”是指横分到一定档次后，依事物发展的顺序，选择能反映历史和现状的重要年代记述。

志书的文体为语体文（白话文）记述体。语体文指运用现代汉语著述的文体。记述体是文章体裁的一种，即把事物的特点、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和人物的经历（即体现记述的六要素：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原因和结果），如实地记录下来。志书文风（语言文字风格）的要求是：严谨、朴

实、简洁。

二、篇目设置

篇目是志书编写的提纲，是方志体例的具体体现和实际运用，设置好篇目至关重要。部门志是以部门为范围，它要求“小而全”，除全面、系统地记述本部门主管的主要业务外，还应包括党的组织、行政领导机构、工青妇组织、行政管理、后勤管理、职工生活、人物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反映整个部门事业的兴衰发展。

志书篇目设计有章节体、条目体、章节和条目结合体三种类型。部门志篇目设置体例应根据具体所涵盖的内容和所掌握资料的多少而定。部门志一般采用章节体，以章、节、目三个层次横排纵写为主。

一部完整的部门志书，其框架结构应由卷首、正文、卷尾三大部分组成。卷首部分，由图、照片、编纂机构、序、凡例、目录、概述、大事记组成；正文部分，即部门主体事业各章，从部门事业的实际出发，从业务的性质、内容和规律来设置章节，是部门志的主体工程。卷尾部分，由附录、文存、编后记组成。概述、大事记和附录一般不设章和节。

在篇目设置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按事物的科学属性分类。一是设篇立章、设节立目，要按照“横排门类，事以类从”的原则，将事物分门别类排列，先分大类，大类下分

小类，小类下再分条目；二是要处理好统属关系，也就是篇与章、章与节、节与目之间是领属关系，篇、章、节、目标题的外延依次递减，不能出现“父子同辈”的标题。

2.项目要齐全，不漏主项。部门志应该成为本部门的“百科全书”和“史书”，应将所辖各项事业，从横、纵向方面充分展开记述，详记部门的整个历史变迁和发展。客观真实的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避免遗漏和重复。

3.要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在安排总体篇目时，要考虑到突出本部门的特点，设章列目要详细，有的可以适当升格或前移。对于共性，则不必罗列过细，避免冗赘、繁杂。

4.要简繁适当。同级篇目之间的分量比例大体均衡；篇目设置一般无章不成篇，无节不成章。

5.把握好标题用词。志书篇、章、节、目的标题，有揭示主题、概括内容、提示读者的作用。拟定标题时，一要准确；二要简洁；三是以名词或主谓词组、联合词组作标题；四是标题尽量不要加修饰性的词语；五是不要用论文、通讯报道之类的标题。

6.注意突出特色。一要突出时代特征。如对部门体制的新变化、职能的调整、产业的新发展、科技的新突破要有足够的认识，对新的经济增长点或部门发展的鲜亮点要敢于设立专门的篇、章、节进行记述。二是要突出行业专业特色。突出本部门本行业的主体业务，显现出本行业本专业的基本特

点、属性和发展规律。要注意抓住典型、抓住特色，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三要具有专门性。如党委和政府因所处的位置和站的角度不一样，在某一件事情的表述方法就不一定相同，党委主要从意识形态出发，记述如何决策；政府主要记述如何实施。又如，对同一文物场所的记述，文物管理部门是从文物保护角度设章立节；旅游部门是从旅游开发立意。

三、部门志的编纂

首先，要成立编纂机构。成立编纂委员会，下设编辑部，所有的编辑工作在编辑部领导下具体实施，编委会研究决定编辑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其次，要收集资料。按照制定的部门志编纂篇目方案进行资料收集。范围大致是：1、机关历年的工作总结（包括本单位的年度总结、专项工作总结或大型活动总结等）。2、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的机构组建和变化文件。3、历任领导人和中层干部任职文件。要设章节或以列表的形式反映历届领导人、中层干部任职情况和职工人数、学历构成、职称构成等情况。4、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关于本行业发展的文件。5、各种专题材料（汇报材料、调研材料、统计资料和业务报表，以及阶段性的资料汇编）。6、对本单位一些特别重大活动的新闻报道和先进人物事迹材料。7、本单位职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作品。特别重要的、对工作有普遍指导意义、有启示作用的调查报告或专题论文可以对照

原文，编入志书。8、口碑资料。9、反映本单位工作和活动的彩图和照片。要具有代表性和反映力，要有准确的文字说明和摄制日期。收集资料时，既要收集反映事业发展、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资料，又要有反映失误和教训的资料。

三是志稿的撰写和审查。要经过初稿撰写、评议修改、审查定稿几个阶段。在志稿编写过程中，必须坚持“存真求实，科学客观；体现时代特征，突出部门特色；以类系事，横排纵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体现规律，述而不论；以事系人，生不立传；详略得当，重点突出；政治、经济、人文、社会等内容并重”的编纂原则。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顺时记事。即依时间顺序，把事物的兴衰起伏记载下来。记述较复杂的事物，为避免时序颠倒，则要处理好各个事物之间的关系，一是对篇目再度修订，尽可能将几种本质不同的事物分别设置；二是在同一竖写单元内，根据事物的多少，分别用几个自然段加以记述。

（二）努力体现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应根据主题要素的变化和发展特点呈现的阶段性分阶段记述。纵不断线是不断阶段，横不缺项是指起决定作用和变化的要项不缺，以及横断面反映事业发展的要素数据不缺，在阶段中没有变化的数据不缺，做到断面清晰，脉络清楚。从志稿编纂的实践看，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



在：一是用记述大事记的方法代替记述事物发展的阶段性的方法。志书要体现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不仅要有选择地记述事物发展的量的变化，尤其要记载事物发展的质的变化。二是用历史分期、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分期等硬套事物的发展阶段性，这就违背了不同事物的运动形式及其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客观规律。

(三) 着力记好起点、转折点和终点。记好起点，就要研究事物发生时的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确定竖写实体的基本要素。若事物的起点在志书的上限之前，则要记述志书上限时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况。

记好转折点，就是要记好事物发展过程中重要变化（如事业的兴衰、政策的变化以及性质、状态、规模等转折性环节）的年份，也就是事物发展出现重大量变或质变时的情况。如果所记实体为多元化的事物，还要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加以记述。

记好终点，即记好事物终止时的情况，交待何时、何物因何原因而消亡或终结。若事物在志书下限时尚未消亡且正在发展之中，按照志书断限的要求，则要记好志书下限时事物发展的现状。对于现状的记述，一般要记得详细些，也要按照事物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把握几个要素来进行记述。

(四) 点线面结合。志书的章法要求述而不论，但又要寓因果于记述之中。这就要点线面结合，对事物各项主体要素变化的资料进行科学排比，从

主题和主体要素、辅助要素的联系中反映事业发展的因果和规律。

点是指事物代表部门或当时先进水平的典型事例；线是指事物发展的主线，也是主题要素的发展轨迹；面是指各主题要素发展变化形成的线索及其在各阶段所形成的横断面。

沿着主线，把事物发展变化的主体资料、典型资料和辅助资料贯通起来，呈现出各个阶段最能反映部门事业发展的要素数据。这样记述，纵看成线，看出事物的发展脉络和立体状态；从点，看到某些要素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事物发展的水平和特点；横看是面，可看到事物间因果关系和发展的广度。

(五) 对资料的真实性进行考证。志书的生命力和权威性在于真实。用于修志的资料必须详实可靠，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科学性。对搜集到的资料必须加以考证，方法主要是通过各种材料互相印证，发现其中的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然后进行比较鉴别，分析其来源的可靠性、内容的合理性。对于一时无法确认的资料，可以诸说并存，或者宁缺毋滥。

(六) 处理好正反两方面材料的关系。志书主要记述正面的东西，但对失误也不能忽略，可以为后世提供借鉴。怕记失误，是方志界一个通病，笔者认为在重点记清成绩、充分体现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基础上，适当记一些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难点，如民生（医疗、住房、下岗就业等）、党风、民风、社会治

安等问题，是现代修志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修志者的应尽之责。正确的态度是重大事件和典型事例不回避，记事略人。记失误和案件，要综合分析，选取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案例；也可在记事物发展过程中，穿插记述成绩错误，寓褒贬于记述之中，以此体现经验教训。也可在概述中发一点议论，评判是非，分析其优势、劣势。

总纂是志书编纂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按照确定的全书宗旨、体例等原则将分工编纂的各部分志稿合成一书，使全书各部分衔接呼应自如、风格协调、笔法一致的加工过程，是确保志书质量的重要步骤。总纂的方法主要是统稿人员通览全志稿，决断是非，把好政治关；分合取舍，终定篇目，把好体例关；查核资料，精益求精，把好史实关；斧削笔润，精雕细刻，把好语言文字关。

志稿评议是组织召开志稿评审会，指出志稿的优点和不足，形成终审稿，报同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终审。终审稿必须做到“齐、清、定”。齐，即图、照片、编纂机构、序、凡例、目录、概述、大事记、正文、编后记等齐全不缺；清，即志稿的字体、字号、版式、纸张大小整齐划一，按统一标准排版，装订成册；定，即志稿内容已经过编纂委员会（或编纂领导小组）审定，内容不再有较大变动。

（作者单位：四川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第二轮修志信访工作入志思考

——以已出版的全国第二轮修志试点单位志书为例

□ 莫艳梅

【内容摘要】第二轮修志，信访工作入志必不可少。作者认为，以设置在政府（综合政务）篇目之下为佳，既要记载信访机构、信访制度、信访数量，又要记载信访内容、成因、规模、处理情况，做到面、线、点结合，入志资料有个性，数据对比性强，反映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

【关键词】地方志 信访工作 入志 思考

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①信访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人权救济方式。它产生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和纠纷解决机制的不健全背景之下。

可以说，信访是富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社会现象，信访制度也是富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特殊制度。作为当代中国政法体制中重要的一环，信访制度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基础的。新时期修志，信访工作的入志必不可少。一是它可以反映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信访制度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在表达群众意愿、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良性沟通、实现政治和社会

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信访的成因、规模和内容特点也不一样，信访工作的难度、做法和成效也不同。二是它可以增强志书相关内容的因果关系。如群众的呼声、人大的建议、政协的提案、各单位部门的建议和意见等，都是党委、政府决策的基础。入志的信访内容，无疑也与党的重大决策、政府施政、人大议案、政协提案等章节内容相关联，有因果关系。

目前，信访工作入志没有定式，有的设置在中国共产党的篇目下面，有的设置在政府的篇目下面，有的是单列在综合政务的篇目中，但共同点是都有专门的信访篇目，以居第三层次的为多。

以已出版的5部全国第二轮修志试点单位市县志为例。《邗江县志（1988—2000）》，

在“人大政府政协”编^②“人民政府”章下设“信访工作”节；《秦皇岛市志（1979—2002）》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板块^③“党务工作”类目下设“信访工作”分目；《高安市志（1986—2006）》分别在“人民代表大会”卷^④“主要工作”章下设“来信来访处理”节，在“人民政府”卷“政务管理”章下设“信访工作”节；《义乌市志》（皇古—2008）在“政治”卷^⑤“人事与综合政务”篇下设“信访”类；《萧山市志》（1985—2001.3）在“人民政府”编^⑥“政务”章下分设“信访工作”“社会热点问题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节，均为第三层次。

上述信访工作分别设置在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综合政务）等篇目之下，主要缘由是信访工作的



归口不一与变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党委、政府开展的信访工作，是领导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它区别于立法、司法等机关的最大特点，是运用领导和行政管理职能，直接处理和解决信访人反映的各种问题。专职信访工作机构是党委、政府开展信访工作的参谋助手，履行综合协调的职能。因此，笔者认为，从事物的主体性质看，并以归口管理、事以类聚为依据，信访工作以设置在政府（综合政务）篇目之下为佳。

信访工作记述要有深度。首轮志书记述信访工作有深度的不多，记述的内容大多为机构设置、制度建设、信访件数以及处理件数等。第二轮志书记述信访工作有深度的仍然不多，记述的内容缺少分类、成因、规模、典型案例等，领导机关解决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以及重要信访的举措和典型案例更是少之又少。

已出版的5部全国第二轮修志试点单位市县志各有特色。《邗江县志（1988—2000）》之“信访工作”节，记述了制度建设、信访处理，1页的文字篇幅，另有1个数据表（含历年来信、重要信访件数、来访批次、人次数据）。《秦皇岛市志（1979—2002）》之“信访工作”分目，记述了机构设置、开展落实政策工作、

接待人民来访情况，包括规范信访工作秩序、控制越级上访、加强暑期信访工作，2页的文字篇幅，无表格。《高安市志（1986—2006）》之“来信来访处理”“信访工作”节，分别记述了人大代表、群众来信来访处理，2页的文字篇幅，另有1个数据表（含来信件数、来访人次、办理上级交办件数、本级自办件数）。《义乌市志》（皇古—2008）之“信访”类，记述了机构设置、信访制度、信访办理、重大信访查办，5页的文字篇幅，另有2个数据表（含历年来信件数、来访人次，重要信访件数、集体信访批次、人次），有一定的存史价值。

《萧山市志》（1985—2001.3）有所不同。该志分设“信访工作”“社会热点问题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处理”3节，8页的文字篇幅，另有3个数据表，即“1985—2000年萧山信访内容分类情况表”（含批评建议类、求助类、申诉类、揭发控诉类、其他类的信访内容）、“1985—2000年萧山信访受理情况表”（含信访局、镇乡、部门的受理的信访件数）、“1986—2000年萧山重要信访查办情况表”（含信访局立案、中央省市转办、市长接待日接待的办结件数）。文、表结合，面、线、点结合，可谓浓墨重彩。不仅记述了信访机构、制度，信访特点、成因，信访分类、查办件数，还分年度重点

记述了信访涉及热点问题以及领导机关对社会热点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等，堪称“信访工作入志”较为成功的编纂模式，可为其他志书所借鉴。

总之，信访工作入志要避免流水账式、平面式的记述，既要记信访机构、信访制度、信访数量，又要记信访的内容、成因、规模、处理案例等，做到面、线、点结合，入志资料有个性，数据对比性强，反映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彰显与党的重大决策、政府重要施政、人大议案、政协提案等章节之间的关联性和因果关系。

注：

①国务院《信访工作条例》（2006年6月22日）。

②《邗江县志（1988~2000）》采用中篇结构，分编、章、节、目4个层次。

③《秦皇岛市志（1979~2002）》采用板块类目体，分板块、类目、分目、细目4个层次。

④《高安市志（1986—2006）》采用卷、章、节、目4个层次。

⑤《义乌市志》（皇古—2008）采用大卷多篇体式，卷下分篇，篇下设类、目。

⑥《萧山市志》（1985—2001.3）采用编、章、节、目结构。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

从相似中探求弃弊趋利之法

——以制造业的“3D”打印与修志的方法为思考对象

□ 王广才

世界上的某些事物，不论是物质范畴的还是非物质范畴的，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总观整个制造业与当今修志活动（就方法而言）即是如此。

一、弊端相似。传统制造主要是“去除型”。它需要模具、翻砂、成胚，尔后使用切割、磨削、腐蚀、熔融等办法，去除多余部分，得到零部件，再以拼装、焊接等方法组合成最终产品。这种制造工艺投入大、耗时长、质量受限、浪费严重。联想到修志，传统的方法也主要是“去除型”。时间上，首轮修志，短的7-8年，长的13-14年；二轮修志，一般说短的3-5年，长的8-9年。程序上，要经历谋划筹备、组建队伍、分层培训、调查资料、撰写分志、分纂总纂、三级审查、补充加工、打磨修改、定稿付印、审核校对等。资料利用率，一般是调查资料与成书资料为2:1。已出的三级志书，有精彩也有瑕疵，“社会上有些极重的事实，在县志中并找不到”^①，“有的状若砖头，内容却变得枯燥”^②。志书是地情书。修志工作“是在各级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下对地情、国情的全面调查”^③。志书为载体，地情

为客体，客体的重要方面，都应在“全面调查”之列，经调查之后还应予“全面记述”。但大多志书（志稿）仅反映了5、6分地情，还有4、5分尚未反映。这就是有些重要事实在志书中找不到的原因。如上所述，修志的时间、付出的代价、得到的结果不成正比。事实证明，传统修志，其繁复的程序，落后的“工艺”，冗长的时间，不菲的消耗，有限的效果，已远远不适应转型期“又好又快”修志的需要。

二、拐点相似。以“3D”打印为特征的制造业出现新的技术革命，整个世界的制造业与物流格局都会因此被彻底颠覆。

“3D”打印，是1984年美国开发出从数字数据打印出3D物体的技术，并在2年后开发出第一台商业3D打印机，能“打”出三维的立体实物来。与传统的“去除型”制造技术相比，3D打印则是“增材制造技术”。它无需传统制造程序，直接根据计算机图形数据，通过一层层增加材料的方法直接制造出任何形状的物体。这不仅缩短产品研制周期，简化产品制造程序，提高效率和质量，而且大大降低了成本，因此被称为“增材制造”。如钛合金3D打印低成本、高质量、快周期，原本相当于材料成本

1-2倍的加工费，现在只需原来的10%。由于采取快速一体成型，不仅节约了时间，还大大提高了强度。3D技术不仅在航空航天领域露出锋芒，在其它工业制造、生物医疗、建筑工程、个性化定制等领域已有广泛应用。

而修志事业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入以“又好又快”为着眼点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实现这一目标，不借鉴“3D”打印技术是不行的。这种技术在修志中的体现，就是像制造业那样，编纂什么样的志书，首先确定标准、总容量、各部类字数及所要的材料以及用什么方法来实现等，事先设计好，需要的就设计进去，不要的就不考虑，形成类似于工业产品制造时所依据的“三维计算机图形数据”，尔后进行“增材制造”。过去修志中一审、二审、三审时的删削，在新的修志过程中均可前移，也就是在谋划阶段即定取舍。这样像“3D”制造那样，大大节约了时间和资源，一步实现了质的跨越，达到了“又好又快”。坚持走高端设计、高端成型的路子，那么最后的结果必然是高端产品（以下简称“三高”）。

具体到志书（指续志），“三高”的初步构思如下：主旨，应坚持“民生立志”，官、

民内容之比应大致是4:6。体例,采取“两级结构”或“三级结构”的模式进行编修,以减少层次,避免“叠床架屋”。这样的架构模式,立足点在于“解决综述的深度问题,尽量避免模式本身去分割一件较完整的事物,从而使编者有较多的时间和空间去研究、筛选一些‘观点’材料,集中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性和某些重大问题”^④。着点,应“突出重点、兼顾一般”,量质兼顾以质为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重点、特点、亮点、看点(以下简称“四点”)上敢作为、会作为、多作为,在非“四点”上慎作为、巧作为、少作为。在这方面坚持“以一当十”,而不能“以十当一”。一般性内容删、重要性内容增各50%。删的对象,应是机构、会议、人事更替;一般铺垫、过渡、衔接、交叉、重复;流水账、低层次的内容等。增的对象,大的方面,应是居民(人口)、人民生活、改革开放、经济综览、互联网络、农村农民、精神文明建设等;中观方面,应是处于章之层次的内容,如灾害规律及特点,阶层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居民投资理财状况,收入差距状况,长寿老人、“失独老人”“空巢老人”结构及特点,妇女地位及变化,知识分子状况,企业家状况等;微观方面,应是举不胜举、无处不在的“新”和“变”,如环境和环保、人们观念、接人待物、婚姻家庭、衣食住行、文化生活、社会治安、“三类”

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疾病等方面的新和变等。成型,应走“增材型”的修志路子,需要什么挖掘什么。参照“3D”打印的修志方法,应以“小兵团”性的专家修志为主,“众手成志”的方法为辅。“从分析研究资料到文字的纵写,都适宜于有一定层次和水平的专业人员来完成。这不仅对提高志书质量有保证,而且由于模式本身给纵写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和资料的选择搭配更应准确、严密与科学”^⑤。这里说的“小兵团”性的修志人员,范围包括编制内的专业人员,熟知地情、退离一线的有关领导,专业相近的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社会上方方面面知情者、文笔好并有志于此的热心人。效果,应符合《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具有较高科学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大家公认,堪称典范,经得起社会和历史的检验。差错率要低于国家规定的万分之一的标准。特征,应当文约事丰,结构合理,特点鲜明,求新求变,科学严谨,印制规范。

三、延展相似。由“3D”打印到方志编纂,延展开来,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思考。一是选帅问题。要实现修志工作跨越式发展,必须要像制造业那样,有像孙聪一般对“3D”技术理解到位的总设计师(歼-15、歼-31总设计师)——志书总纂或总编,才能深谋精虑,巧妙构思,科学组织,高效运作。二是选材问题。选取材料一在“普选”,

二在“精选”。选材与分志撰稿人有密切关系,但这毕竟是条块的、局部的,而不是全局的、统揽的,起此作用的主体是志书核心编纂班子,也就是总纂、副总纂、分纂和责任编辑这个群体。加强对断限内地情全面、系统的研究,了解各个行业纵向脉络、横向状态、特点规律等,是搞好“普选”的关键。精选对象着重是前述的“四点”性内容。三是选“台”问题。修志的平台,核心是类似于“3D”打印的“三维计算机图形数据”,执行是类似于“3D”的激光打印机——核心班子的编纂人员。这台“打印机”要装满“墨粉”,“喷涂”位置要精准,运转效率要快捷,所述结果要细腻、斑斓、立体。这里涉及的主要是统合、剪裁、取舍、拼接等技巧性问题。因此就要求核心纂稿人员,要研究、博取、熟练编纂技艺,达到驾轻就熟的程度。

注:

①吴景超:中国县志的改造,《独立评论》第60期,1933年。

②谈歌:探寻“史记”与县志中间之路,《光明日报》,2011年1月2日第4版。

③2001年12月20日,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④⑤夏临昌,改革方志编纂体例与方法刍议,《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4期。

(作者单位: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

地方综合年鉴彩页运作浅识

□ 杜育和

随着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的深入开展，在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不断繁荣的背景下，走年鉴彩页市场化运作之路是推动年鉴常编常新，确保年鉴编纂工作正常开展和发展壮大的有效途径。

一、开展年鉴彩页运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年鉴彩页是利用现代影像和印刷技术，通过图片形象和文字记述，综合反映年度信息的年鉴类目之一，是年鉴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其形象直观的信息展示年度内一个地区、行业、单位、企业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历史瞬间的真实记录。在市场发育不断成熟的条件下，尝试年鉴彩页征编市场化运作是年鉴编纂机构和人员经营创新年鉴的责任。

1.经营运作年鉴彩页是充分发挥年鉴彩页媒体功能的客观要求。地方综合年鉴是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彩页是年

鉴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宣介、展示等广告特质。在市场发育不断成熟，社会信息化不断加速的今天，社会各界、各行业、各单位、各企业都潜在展示自身的欲望，而年鉴彩页所独有的权威性、公益性、长久性、存史性等媒体功能及其所具备的广告载体特点，可迎合区域内社会各界展示自身的时代需要，地方志机构和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工作者可顺势而为，通过精心策划彩页内容，利用年鉴彩页这一信息载体，多角度展示区域内各行业新颖、多彩的风貌，使地方志工作自觉融入市场和社会的广泛需求。

2.经营运作年鉴彩页是增强地方志工作机构自我造血功能的有效途径。地方志工作要确保持续健康发展，工作经费是基础保障，目前方志机构经费来源渠道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但因地方财力有限，特别是缺乏刚性的执法监督和量化考核，导致有些地方未能将地方志工作经费及时足额列入财政预算，造成方志工作举步维艰。为拓展地方志工作发展途径，在编纂地方综合年鉴

时，引入年鉴彩页市场化运作的理念，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培育和拓展社会需求，既能为地方志机构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实现了年鉴编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3.经营运作年鉴彩页有许多实践经验可供借鉴。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是一项公益性社会事业，是由地方志机构组织、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化实践，在地方政府经费保障不足的条件下，地方志机构可以将这一公益性社会事业推向市场，积极调动和吸引社会资金帮助发展年鉴事业，而经营运作年鉴彩页就是其中有效途径之一。如《中国机械工业年鉴》编纂工作在面临“断乳”期后，实行大胆创新，提出“明确市场定位，细化行业分类，扩大产品品种，差异运作推广”的经营战略，成立年鉴广告部，年鉴广告业务以自营为主导，通过做好客户服务和管理，培养自己的广告专职队伍，对从业人员实行与业绩挂钩的激励方式，按照“统一策划、统一出版、统一营销、统一广告”的流程，实现了年鉴广告业务的



大幅度增长，推动了年鉴内容的创新和质量提高。近年来，弋阳县方志办在年鉴彩页运作方面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取得较明显的成效，筹措资金近40万元。

二、与时俱进，尝试走好年鉴彩页运作之路

地方志工作者对开展年鉴彩页运作往往心存顾虑，主观上的认识局限使方志机构将开展年鉴彩页运作置于无为状态。思路决定出路，理念造就财富，精神状态决定工作成效，责任心决定工作质量。在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时，大胆尝试年鉴彩页运作，实现年鉴编纂工作良性循环，服务于地域和行业发展。

1.转变观念，不断强化年鉴彩页运作意识。年鉴编纂是地方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在编纂经费尚未得到政府财政有效保障的情况下，不能因噎废食，荒废年鉴编纂事业，必须转变观念，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年鉴的理念。从年鉴自身的发展来看，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适应变化发展的新形势。从周围环境来看，各媒体争先恐后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在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领域开展广泛激烈的竞争，我们决不能因为眼前“背靠政

府”而高枕无忧，应该具有强烈的危机感。从年鉴事业长远来看，“面向市场”是大势所趋，许多地方在年鉴编纂实践中已在这方面进行大胆的尝试，并在市场经济中闯出一条自我发展的新路。所以，年鉴人不仅要有编纂高质量年鉴的水平，还要有驾驭市场、灵活经营的本领，不断为年鉴的生存与发展开辟新领域。

2.精心安排，不断探索符合实际的年鉴彩页运作模式。开展年鉴彩页市场运作必须要有一套符合地域、行业、专业实际且切实可行的方式。《弋阳年鉴》的彩页运作始于2006年，经历了委托代理、合作运作和自主经营的过程。弋阳县方志办在《弋阳年鉴》编纂之初，为筹措经费，开始进行年鉴彩页运作尝试，以合同约定形式委托本省某文化公司代理，当时共筹集资金11万元。文化公司虽然机制灵活，但由于机构归属不一，整体协调较难，导致彩页征编不能反映方志机构的编纂意图。2010年，县方志办对年鉴彩页运作方式进行调整，采取与文化公司合作方式，县方志办负责拟定彩页征集范围和标准，规定彩页版面数和最低入编价位，文化公司负责彩页征集、制作和入编费用收取，当时共筹集经费

10万元。随着年鉴彩页被社会的认可和接受，以及县方志办对彩页征集工作经验积累的增加，2012年县方志办对年鉴彩页运作实行自主经营，组织人员策划年鉴彩页专题，实行责任到人，主动开拓入编年鉴彩页市场，共落实入编单位和企业65家，策划彩页版面54页，筹集经费17万余元。

3.强化责任，不断推进年鉴彩页运作深入开展。运作经营好年鉴彩页务必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做到责、权、利统一，人员分工明确，职责分明。弋阳县方志办为抓好《弋阳年鉴(2012)》的彩页运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一是以县政府办的名义下发征集年鉴彩页的通知，明确彩页的要求和规范。二是年鉴编纂人员各负其责，由主编策划彩页专题和文案设计，以栏目编辑为主，上门沟通并推介年鉴彩页业务，财务人员及时做好票据开具及结算。彩页编排设计后由责任编辑反馈到入编单位征求意见，并签字认可。

三、锐意创新，提高年鉴彩页运作效益

年鉴彩页是年鉴整体内容的有机部分，是地方年度内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形象反映。在开展年鉴彩页运作过程中，要在坚持彩页实用性、存史性的基础上

与时俱进 力求创新

——地方志学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 陈致英

乐山市地方志学会自1987年成立至今，20多年间致力于促进和推动全市地方志的研究、编纂、整理、出版，普及方志知识，开展读志用志，主动融入到推动乐山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工作格局中，为乐山建设文化强市作出积极贡献。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市地方志学会与时俱进，追求创

积极创新，努力提高彩页运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要创新意识。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是地方志机构的一项主业，地方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编纂出版高质量的年鉴服务社会的同时，要彻底改变重编纂轻经营意识，把编纂地方综合年鉴作为产业来经营，作为地方文化品牌来打造，既要主动服务地方党政，依法争得生存空间，更要积极适应社会环境，调动和吸引社会资金帮助改善年鉴事业发展条件。

二要创新方法。运作年鉴

新，更好地为乐山的方志事业繁荣发挥参谋智囊作用，更好地以史为鉴，服务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乐山这个工作大局。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创新。

一、在组织会员参与第二轮续修志书的实践中着力创新。《乐山市志（1995-2006）》是乐山“十一五”期间文化事业跨越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更是乐山地方志工作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各县（市、

彩页要经历一个邀约、应约、达成的过程，因此要做到因事制宜，以应约方为中心，开展前期调研、彩页征集定位、征集采编方案拟定和彩页文案设计等工作。运作年鉴彩页既有行政行为的因素，又是市场行为，年鉴编纂机构及其人员要调整工作方式，适应市场机制，全方位跟进应约方做好宣传、参谋、服务工作，实现年鉴彩页由邀约方和应约方互赢共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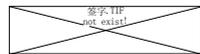
三要创新形式。通过市场平台开展年鉴彩页运作过程

区）也相继全面开展了县志续修工作。这次续修志书的时间跨度，正是我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和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的重要时期。

如何通过志书忠实地记录这段历史，凸显续志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更好地起到“资政”作用，需要学会会员发挥专长和优势，积极主动参与续修志书的具体实践，并把创新的理念贯穿于续志的全过程，编纂一部既突出时代特

中，彩页已是被赋予相应价值的文化资源载体，为实现年鉴彩页运作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年鉴编纂机构及其人员要主动满足应约方的需要，在彩页中可设计不同的版面定位，如封面、封二、封三、封底，半版、整版、连版等，还可根据应约方特殊要求，开辟专题或专栏。总之，跟进调整年鉴彩页设计，在创新中提升年鉴彩页运作成效。

（作者单位：江西省弋阳县地方志办公室）



征，又富有乐山地方特色的信史佳志。

在续志实践中着力创新，首先是依法修志。其次是突出时代性和地方性，从各地区实际出发，求专避散，求质避滥，选准切入点，开发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资源。再次是在续志的纲目设计和编排结构上追求新意。纲目的设计要便于收集资料，便于编纂，更要考虑便于检索和查阅。编排结构上要充分利用好图、表、照等生动直观的资料，与相关文字配合编排，既突出图文并茂，又使图文互为参照。

二、在组织会员开展方志理论研讨上着力创新。地方志的编纂，覆盖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多个领域，既涉及多门学科知识，又具有各自的专业特点和知识理论体系。做好地方志的编纂，需要理论的武装和指导，修志人只有做到理论上的清醒，才能成为实际工作中的“明白人”。

在方志理论探讨、研究上着力创新，首先是组织会员学习新理论、新知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方志理论和知识也在与时俱进，不断产生新的理论成果，如果不注意学习新知识，就可能囿于固有的框框和陈式。只有不懈坚持关注方志理论的新发展、新

成果，并运用于实际工作中，才能使方志理论研究具有创新的理论知识基础。其次是拓宽和丰富方志理论研究的内容。要探索和研究方志编纂的外部环境、保障条件、地方政府职责等新的内容。乐山市地方志学会组织会员结合工作实践，积极进行业务知识学习和理论研讨，重点围绕落实《地方志书质量规定》，提高第二轮志书质量和综合年鉴水平进行业务理论探讨和交流。再次是更新方志理论研究的理念和方式方法。比如在方志编纂中，如何引入和运用系统论方法，把握和体现和谐的理念、以人为本的观念、创新的观念等。

三、在组织会员开展读志用志上着力创新。编纂地方志的目的不仅是记述历史，传承文明，更要发挥其“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为当前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努力做到“经世致用”，使地方志真正成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资料库”，成为各级领导决策的咨询工具，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智囊。在读志用志上着力创新，首先是加大地方志资源开放利用力度。坚持修志为用原则，乐山市根据《乐山市地方志资料信息工作规定》，加

强地情资料的收集整理，实行方志地情资源挖掘和开发利用并重，开展了《乐山儿女在他乡》（第一至三辑）《走近郭沫若》《乐山历史上的今天》等地情丛书的编辑出版，力争成为展示历史文化底蕴，促进对外交流、招商引资的文化名片；及时地为地方党委、政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料和决策建议，为社会各界读者提供地情资料信息和咨询服务。其次是增强地情资料的实用性。着眼于有用、可用的目标，充分发挥地方志的存史、教化功能，及时地搞好各类新地情资料的收集、研究和编纂出版，整理和规范旧志资料古为今用，使之成为集科学性、权威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资料库。再次是实现地方志资料的数字化处理和网络化传播。着眼于信息社会和“注意力”经济的时代要求，学习运用科技发展新成果，在资料搜集、整理、编纂等各环节普及数字化科技手段，在传播方式上采用网络化技术手段，以扩大读志用志的覆盖面，扩大地方志的社会影响，更好地发挥地方志的社会效益。

（作者单位：四川乐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民间文学中的南充蚕桑丝绸材料

□ 文建刚 刘艳伟 闫小芹

【内容摘要】南充民间文学中有很多极富价值的蚕桑丝绸材料。应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通过搜集和整理这些材料，考证始蚕者的真实身份，弄清伏羲织造之谜，比较民间传说故事，剖析其中的历史信息，在历史事实和真相的基础上，阐明这些民间传说故事的巨大价值和意义，以史为鉴，从而促进南充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南充 蚕桑丝绸 民间文学

千年绸都南充，在中国蚕桑丝绸业的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本文试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在对南充地区有关蚕桑丝绸业的民间文学材料进行搜集和整理的基础上，为南充蚕桑丝绸业的发展及其历史文化研究发掘一些历史信息，并对相关问题作简略之探究与辨析。

一、民间文学中南充蚕桑丝绸材料情况

较之南充繁荣的丝织业，有关蚕桑丝绸的民间文学材料的整理与研究略显不足。在相关研究方面，现阶段国际、国内学术界对于南充地区的蚕桑丝绸文化研究较少，且研究内容集中在历史考证、旅游开发、丝织业发展等方面，对南充丰富的蚕桑丝绸民间文学材料搜集整理的论著还付之阙如。笔者通过文献检索和实地考察等方式，结合前人的研究

成果，现将搜集材料归结为“神话”“传说故事”和“谚语诗文”三大类，汇总如下：

（一）神话类

南充地区有关蚕桑丝绸业的神话故事大致有以下两种：

1. 蝶仙与雒雒的故事

在南充嘉陵江畔，“千年绸都第一坊”里树立着一座美丽的雕塑——蝶仙。蝶仙上身是个美丽的女子，中间是蚕儿的样子，下半身包裹在雪白的蚕茧里，背后是两只斑斓的蝶翼。关于蝶仙，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帝喾高辛氏时，蜀中某女之父被人掠去，只剩所骑白马返回。其母伤心之致，发誓道：谁能将其夫救得生还，就把女儿嫁给他！白马闻言仰天长啸，挣脱缰绳疾驰而去。几天后，白马载着其父返回家中。其母却反悔，不再提及嫁女之事。从此白马整日嘶鸣不止，不思饮食。其父

见状，心中为女着急，取箭将马射杀，并把马皮剥下晾在院子里。但见那马皮突然飞起将姑娘卷走，不知去向……数日后，家人在一棵树上找到了姑娘，那马皮还紧紧包裹着她，而头已经变成了马头的模样，正伏在树枝上吐丝缠绕自己。家人将其从树上取回饲养，养蚕吐丝结茧缫丝的历史从此开始。由于这种虫子总是吐丝缠绕自己，人们就把它叫做“蚕（缠）”；又因为姑娘是在树上丧失生命的，大家就把这种树叫“桑（丧）”。人们为感激姑娘带来了丝绸锦衣，把她尊为蚕神，称为“马头娘娘”。^[1]

与之极为相近，南充南部县地区还流传着《雒雒的传说》^[2]：唐朝郭茂盛大将军在被敌人围困时向将士们许诺谁能退兵就许以长女。一匹白马冲入敌阵中，败退了敌军。但获胜后的郭将军并没有实现承

诺。白马日夜都在郭大小姐的住处外悲号。郭将军问原因，马童回答是将军没有兑现承诺的缘故。郭将军气愤地挥鞭打掉了马童的下巴（就是后来的雉雉，又叫鲁奴），射杀了白马，曝皮于庭院中的桑树上，七日化成蚕虫。郭大小姐感念白马的救父之恩，将蚕虫养了起来，化茧抽丝，做成了美丽的丝帛。蚕桑织造的技术从此流传于民间。

在《搜神记》《汉唐地理书钞》《太平广记》和《蜀图经》等古代文献中均有类似少女与白马（牡马）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蚕神崇拜并没有明确的对象，如元代王桢《农书》中记载：“盖古者蚕祭皆无主名。”^[13]《周礼·天官》及《礼记》的《祭仪》《月令》等也未详载蚕神身份。汉代卫宏的《汉旧仪》中对宫廷蚕神祭祀记载：“春蚕生而皇后亲桑于苑中蚕室，养蚕千薄以上，祀以中牢羊，祭蚕神与莞嫫妇人、寓氏公主，凡二神。”^[14]刘安的《淮南万毕书》中也记载到：“二月上壬日，取道中土并华水和泥蚕屋四角则宜，蚕神名莞嫫。”^[15]由此可知，汉时正式祭祀的蚕神叫“莞嫫妇人”和“寓氏公主”，但难以考证具体是何人物，笔者认为有可能就是上文蝶仙与雉雉故事中化身为蚕的少女（蚕女）。首先，从字义上看，“蚕女”与“莞嫫”“寓氏”意义相同。“莞嫫”有

懒女之意，“寓氏”可谓为居于室中者，这两个称谓的涵义正与蚕女的形象十分吻合——蚕女独居家中（室中），不务织造，蓄养牡马，与之嬉戏……。其次，从称谓上看，“莞嫫”“懒女”“蚕女”三者音韵极为相近，很可能是同一指代。且“莞嫫妇人”“寓氏公主”称谓中的“妇人”“公主”在古代都是对女性较为尊敬和高贵的称谓，也表明先蚕者或始蚕者和早期人们祀奉的蚕神是女性，这与早期人类社会的劳动分工一致。第三，蚕女与早期蚕神形象极似。袁珂著《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黄帝篇》中有“蚕神献丝”的记载：“这身批马皮的蚕神，原来是一个容貌姣好的姑娘，只可惜多了一张马皮……”^[16]。这与蝶仙故事（蚕马传说）中描述蚕女的形象基本是一致的。

因此，早期蚕神（始蚕者）为南充地区蝶仙故事（蚕马传说）中的无名氏蚕女——作为蚕神信仰起源之一说似可成立，且其时代应早于唐代。

2. 伏羲回故乡

在今南充阆中渝水地区流传着伏羲氏教民渔猎织造的故事：伏羲在陈州当上部落总首领后，很是眷恋这片曾孕育过他的地方。他先后三次回到阆中。……他看到人们裹着树皮、兽皮劳作很不方便，便从野蚕吃叶吐丝受到启示，教人们养蚕、缫丝织布，人类从此便开始穿上了冬暖夏凉的丝制

衣服。^[17]

故事中伏羲氏在蚕桑织造方面的贡献是不可靠的。^①而蚕桑织造技术产生于阆中地区倒是有可能的。^②

（二）传说故事类

相关传说故事现今多已流失，较难寻觅。本次搜集和整理主要从各类相关文献中进行查找、甄选、辑录。

1. 历史传说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汉族·蓬安县）^[18]：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逃离成都之后便定居在南充蓬安，卓王孙“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这一百个奴人当中就很有的一部分是织锦的工奴，“卓氏锦”便从此闻名遐迩。

这个传说故事说明南充地区的蚕桑丝织业在西汉时期便已有很高的发展水平，而且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较高的评价。

《桑树为啥要破肚子》（汉族·南部县）：^[19]李世民败逃南充时用桑葚充饥，感念桑树的恩情，封桑树为树王，结果挂匾的人错将匾额挂在了椿杨树上，桑树因之气破了肚皮。

农业社会，栽桑养蚕是每个普通家庭必不可少的事项，桑树对丝织业的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这则故事中桑树被赋予“树王”之号，说明丝织业在农业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劳动人民心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古代南充地区丝织业的发展

达及其对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

2.南充关于矮马桑由来的传说

《马桑树的故事》(汉族·南部县)^[7]:黑心财主将太阳绑在高高的马桑树上以延长长工们的干活时间,罗衣秀才传法给长工们砍倒马桑,使其不再长高,最终气死了财主。

故事以马桑树作为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间接说明桑树在南充地区的重要性和种植的普遍性,从而反映了南充丝织业繁荣与兴盛。

《长不高的马桑树》^[8]和《马桑树为啥这么矮》(汉族·营山县)^[7]:古时候马桑树非常高,孙悟空(及其猴子猴孙)借助阆苑东端一株参天的马桑树爬上天庭,到处惹是生非,将天庭弄得乌烟瘴气,下界洪水滔天,玉帝在惩罚孙悟空(猴子猴孙们)之后,派金甲大力士将马桑树砍光了,并下御旨让马桑树再也长不高了。

马桑树高可通天当然是虚构的,但在古蜀地确实有“神木崇拜”的存在。这两则故事很可能就是根源于古蜀人早期的“神木崇拜”,体现了桑树在古代南充人民耕织生活中的重要性。

3.地主的故事

《两匹金马》(汉族·西充县)^[7]:大财主龙商家养出个巨大的蚕茧,一个路过的道士发现龙商家对面大山的石壁里有两匹金马想吃龙商家的蚕

茧,就向龙商高价购买蚕茧。狡猾的龙商觉察出了其中的奥秘,道士只好坦言相告,并约定两匹金马一人一匹。贪婪的龙商乘道士出去办事,念动了打开石壁的咒语,用蚕茧引出金马,但龙商没有关闭石壁的咒语,又急又气的龙商企图拉住将要回到石壁中的金马,却不料被力大的金马拖进石壁,再也没有出来。

这则故事以民间养蚕的历史事实为背景,结合古代的“蚕马同气”的传说,反映了旧社会中丝织业的具体情况。

综上,这些传说故事产生于人们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流传于民间,故事朴实直白,形象生动,较多的反映了养蚕制丝作为小农社会中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其重视与喜爱。

(三) 谣谚、诗文及其它

本次搜集和整理,主要是从《中国民间文学南充地区歌谣谚语集成》《古代民歌一百首》《蜀锦史话》和《中国古代神话故事萃编》等著录及《诗词歌赋誉丝绸》《四川蚕织业诗词歌赋选(1-5)》和《老歌伴随的记忆》等论文中查找、辑佚和整理出的一些与南充地区蚕桑丝绸相关的材料,共有歌谣5篇,谚语7则,诗文20余篇。

谣谚有《养蚕歌》(南充仪陇):“黄桶这么大,扁担这么长,黄丝压断秤号梁”^[8]。

诗文有唐代郑谷《蜀锦

诗》:“文君手里曙霞生,美号仍闻借蜀城。”^[9]张何《蜀江春日文君濯锦赋》:“织回文之重锦,艳倾国之妖质。……岂若乎齐纨之与楚练,岂并细縠之与轻纱。”^[9]以华丽的辞藻,描绘了丝织品的华美,赞扬了织造者的心灵手巧,表现了古代四川丝织技艺的高超。

又如程启《蚕织图》中的五言配诗《浴蚕》《喂蚕》《一眠》《二眠》《三眠》《下簇》《缣丝》^[9]等,是对蚕桑农事经验的较为全面合理和精到的整理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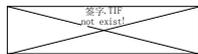
又有唐代王建《簇蚕歌》^[9],描述的养蚕缣丝的过程、技艺与今天我们的养蚕方法技术基本上是一致的,反映了古代养蚕制丝技术的先进,是历代劳动人民劳动经验与高超智慧的结晶。

二、民间文学中南充蚕桑丝绸材料的价值

中国作为一个曾以丝绸而闻名于世的国度,养蚕制丝的历史悠久而灿烂,有关蚕桑丝绸的民间文学不仅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其价值更是极为重大:

(一) 文学价值。民间文学中各色人物形象及其语言、故事情节等,夸张、神异又不乏唯美之情,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而原始的素材和表现形式,并以其丰富的内容嬗变成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

(二) 历史价值。存在即为历史。这些材料植根于南充



试说孔子访苕弘

□ 张 麟

孔子访苕弘，是说举世闻名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在公元前518年，带着对东周王朝日趋衰微、礼崩乐坏等问题的疑问，访问苕弘的历史事实。其时，苕弘已盛名于世，是东周的三朝元老，是大学者、大忠臣、贤德的敬王大夫，后无辜受戮，死而血碧，

悠久的养蚕制丝历史之中，体现了人们的精神内涵和思想意识，反映该时代的社会原貌，很多材料本身就是较为可靠的史实、史料，可以作为正史典籍的补充和考古发掘的重要参考，是研究南充蚕桑丝绸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 现实价值。传承丝织技艺，合理利用民间传奇故事、民俗节日等，充分发掘南充蚕桑丝绸文化，可以推动丝织业和丝绸文化主题旅游业的发展，提升“绸都”的内涵和品味，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繁荣南充经济。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丝绸历史文化名城，发掘和保护有关南充蚕桑丝绸业的民间文学不仅是今人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发展的客观要求，意义重大。

百姓深为痛惜和敬仰。其“碧血丹心”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访苕弘，又曰“访弘问乐”“访乐苕弘”。《春秋左传》《礼记·乐记》《史记·乐书》载：“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子曰：唯。丘之闻诸苕弘，亦若吾子之言”。就是孔子亲口对宾牟贾说，你对

“声淫及商”的说法，我就亲自听到苕弘讲过，也与你刚才讲的一样。这就是孔子访苕弘、访乐苕弘的历史事实。孔子为何要访苕弘？访苕弘什么乐？需从多方面来研究和印证。

孔子从小耳闻目睹众人对周公的言传，深受周公圣德熏陶；年长，入周公太庙每事问，学得很多周公及西周珍贵的历史知识，对夏、商古史颇

南充教育学院印刷厂，1989年。

[3]曹建南，《中日蚕桑起源传说的比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

[4]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

[5]冉云明，《阆中传说》。

[6]《蜀锦史话》编辑组，《蜀锦史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7]郝振书等，《中国民间文学南充地区故事集成》(下册)。南充教育学院印刷厂，1989年。

[8]郝振书等，《中国民间文学南充地区歌谣谚语集成》。南充教育学院印刷厂，1989年。

[9]廖伦旭，《诗词歌赋誉丝绸》。《四川丝绸》，2000年第4期。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学院)

注：

①上古帝王大都被神化，长存数百载，真实历史较难考证。《蜀图经》中蚕马故事发生在高辛氏时期，据《史记·五帝本纪》，高辛是轩辕氏的曾孙，承颛顼氏之位，是为帝啻。而伏羲氏与黄帝轩辕氏齐名，按之，伏羲应早于高辛。故笔者认为阆中地区伏羲发明蚕桑的传说不实。

②主要与古代四川的地理和气候相关，可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参考文献：

[1]王玉贵，《蝶仙传说》，2008年。

[2]郝振书等，《中国民间文学南充地区故事集成》(上册)。

有研究，对西周文王、武王及他所处的东周自平王东迁以后的灵王、景王等近500年的社会了解得非常深刻。他尊崇史称的“三代盛世”，特别崇拜周公；有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怀抱济世之才，却怀才不遇，思虑的是周文王、武王开创的西周盛世，万民拥戴，对所处的周室衰微，民不安生，社会混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礼崩乐坏，令人伤心的现实，百思不得其解，非常想往周王朝五百多年来的都城成周去问个究竟。他深知都城有不少的学者、能人，特别是对老聃、苾弘等大学者慕名已久。正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记：“鲁大夫孟厘子……试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必师之。懿子与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予之一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可见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苾弘，是他的梦想。

孔子到成周后，是否访乐苾弘？《史记》对此没有记载。但《礼记·乐记》对孔子访乐于苾弘作有记载，说明孔子访弘问乐是历史事实。《孔丛子》中《夫子适周》一文记载：“夫子适周，见苾弘。言终退。苾弘语刘文公曰：吾观孔仲尼有圣人表，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



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言称先王，躬礼谦让，洽闻强识，博物不穷；柳亦圣人之兴者乎。刘子曰：今周室衰微而诸侯力争，孔丘布衣，圣将安施？苾弘曰：尧舜文武之道近弛而坠，礼乐崩丧，亦正其统纪而已矣。夫子闻之曰：吾岂敢哉，亦好礼乐者也。”《夫子适周》是孔子九世孙孔鮒写的，把孔子适周、访弘问乐等情况，记得很全面，是孔子访苾弘的很好佐证。

从《夫子适周》一文所谈及的问题来看，孔子与苾弘交谈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也是相当深刻的。孔子想问的问题自然要讲尽，摆问题、谈观点、述衷情，苾弘对孔子提到的问题，自然是有问必答、讲清、讲透。交谈的重点是国家社会、政治、思想、讲礼、谈乐。

《观周》中记载：“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苾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

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开头就用这“一问”“二访”“三历”“四考”“五察”五句话，概括了孔子整个适周的主要活动内容。最后更简括的语言阐述了孔子适周的巨大收获“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观周》把“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苾弘”列在文章的前头，说明孔子在成周访问苾弘是事实。

孔子访乐于苾弘，访的什么乐？除了前面提到的“声淫及商”的研究涉及苾弘外，在笔者所接触和看到的史料中，有谈“礼乐”“乐”“乐音”“音乐”的内容，但未发现有讲苾弘从事乐音的活动。记载苾弘的史籍中，也未发现苾弘大夫有过音乐的活动记载。以孔子而论，年过“而立”又四年的他，年少时就完成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学业。还需学什么？张宗舜所著《孔子大传》中孔子向师襄学弹琴这一小片段也反映了孔子的乐

曲、乐理和演奏水平之高，艺勤且精，绝不会在访乐莒弘时，去问音乐的基础知识。

公元前1046年，武王发动了推翻殷纣王残暴统治的战斗。随着战斗产生了武乐，五百多年后的周敬王二年（前518），孔子访莒弘之后，与宾牟贾研究这部武乐。问到“声淫及商，何也？”就谈到了本文前面所讲：“丘之闻诸莒弘，亦若吾子之言”这一新奇、令人兴奋的史实。这是孔子亲口所讲，孔子的后人将其汇入《礼记·乐记》中。

“声淫及商”是武乐中一个重要内容。它反映了武王实有贪欲纣王江山、取而代之的意思，宾牟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这样，可是，宾在回答孔子所问时，没有直言说出他的看法，而绕了个圈子，说“非武音也”。因孔子曾听莒弘给他讲过此事，他知道“声淫及商”的本意，所以孔子立即追问“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宾发觉这个圈子绕不过去，才绕回来说：“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这才是“声淫及商”的本意：武王伐纣之前，实有夺取纣王天下之意，即“志荒也。”并非“精明神武，应天顺人之志”。这“声淫及商”一事，从孔子谈话透露出，莒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客观公正、合符历史事实的。莒弘对孔子来访，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真心实意的

帮助。

在孔子与宾牟贾交谈的武乐中，因“声淫及商”一问题，透出了“丘之闻诸莒弘，亦若吾子之言”，因此，笔者认为孔子访乐莒弘，不会只谈“声淫及商”一事，莒弘必然要谈全部武乐，即武王之乐“大武”，谈武王伐纣救民，伐纣兴周的胜利，实际就是讲的武王施行仁政，德行于天下，为百姓带来好处，赞武王所制“有序之礼，能和之乐”的胜利。

莒弘是周室大夫，从事政务活动，也就是作的安邦治国的工作。他既懂得又自觉遵行礼乐行事。因此，当孔子问乐于他，所谈的乐就是先王以及周公制礼作乐的“乐”。莒弘是以武王伐纣救民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大武”乐，来谈乐的功能和作用以及与礼的关系，当然乐的范围很广，自然包括“五声”“八音”等等。

《礼记·乐记》谈完孔子与宾牟贾研究的武乐之后，紧接着记道：“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致礼以治躬……”这就是说乐治心，礼治身，乐礼相将，则无事不成矣。即无礼乐不存，无乐礼不行，礼乐不可分。但不能说礼和乐无区别，而是大有区别。孔子访乐莒弘，是讲访乐，而不是访礼乐。孔子成周之行，是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莒弘，是问、访

安邦治国的礼和乐。

孔子成周之行，得到了莒弘的热情接待和亲切交谈，对礼和乐的关系、乐的功能和对社会的作用，莒弘以“武乐”为中心，以武王伐纣救民的历史业绩为事实，理论联系实际的对孔子讲明：武乐就是周武王继夏、商先王的历史经验，制礼作乐以安邦治国及伐纣救民的历史结晶。孔子访乐莒弘，就是周公继先王制礼作乐的“乐”，也就是孔子后来订《礼乐》的《礼记·乐记》中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正如宋朝理学之开祖周敦颐所说：“乐者政也，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故圣人作乐以宣

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盛而太和焉。天地和则万物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作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人文明进步，与时俱进。同时有“丘之闻诸苾弘”这句极其珍贵的史话，否则，苾弘对后世人们尊为圣人的孔子，曾有过亲切会见和帮助，会因无史籍记载而被埋没。更重要的是苾弘对孔子关于“平王东迁”以后周室日渐衰微、礼崩乐坏的问题，对比西周的文王、武王和周公的西周盛世，从安邦治国的角度，与孔子作了深入细致的交谈，使孔子收获不小。《观周》对孔子成周之行所取得的收获，作了全面的总结，自然也包括“访乐于苾弘”的收获在内。苾弘对孔子的热情接待和亲切交谈对孔子后来作《春秋》、订《礼》《乐》，被后人尊称为思想家、政治家是有积极作用的。

孔子后来周游列国，开阔视野，调查研究，获得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人生哲理的博大精深的真知灼见，并办学教书育人，删《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兴“儒学”，为中华民族作出伟大贡献，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被誉为“大成至圣先师”，世界的历史文化名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

两千多年来，“孔子访苾弘”这一历史性会晤，影响深

远，对后世有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意义。在苾弘的故乡资阳，至今留存着很多纪念孔子访苾弘的遗迹。如，《资阳县志》载：“赞圣祠碑，在治南天台山有记。……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15），督学陈鏊经此，见城西道旁周大夫苾弘故里碑，访其遗迹于天台，得旧祠址……乃檄县尹赵廷臣复其旧，且並老子而祀焉。以孔子尝问礼访乐之故也。又以弘之书不可得，而见然于传记，见弘之事周，始终称忠烈，故弘死血化为碧，数里皆青，柳宗元称弘仁义类比干殉洁，轨伯夷，其为人亦大概可知。已而，又以访乐一节，不无一得之助于孔子，因颜其额曰：‘赞圣’”。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记：“《资阳县志》云：南二十里，有孔子溪，石壁上刻孔子字，云其地有乡校，祀夫子，刻记犹存”，清资阳邑令赵曰睿《苾弘故里》诗：“访乐当年文献崇，缅怀遗迹吊资中（今资阳），正诗早识尼山叟，好古还同柱下翁。碧血可能依晋霸，黍离早已咏王风，萧条三尺残碑在，几岁摩挲恨未终”。资阳县《张氏族谱》载：“张氏龙虎二公，明洪武二年，由楚入蜀，去危就安，……占沃壤于圣溪，溪环孔子：置良田于贤岭，岭峙苾弘。”《祠堂祖坟山水图》记：“孔子洞”“苾弘山”“苾弘埂”。苾弘山

廖家庙（苾弘庙）楹联：“峻岭接苾弘古刹重辉通帝讳，清溪环孔子安永澜庆仗神庥。”《资阳县志稿》记：“孔子溪，县南四十余里，昔立乡校于旁，祀孔子因名，遥对苾弘溪，相隔约三里，上有磨石刻清·鲁洙文五律一首：‘雁水漪南岸，滌洄一舍中，溪名苗孔子，人物表苾弘，执轡津须问，惊心逝者同。摩岩苔篆躅，想像写遗踪’。下有孔子溪。”《四川省内江地区地名词典》载：“忠义镇，在资阳南部，1909年置忠义乡，……1951年改名‘访弘乡’，相传春秋时，孔子访问苾弘，故名”。《川史通讲》说：“名气最大的学者是苾弘，……他的出生地望二溪，苾弘寨、苾弘洞（今访弘乡、忠义镇）均在资阳县境……故苾弘实有其人，也确是川人。他的学问广博……连博学多才的孔子也访乐于苾弘。”修苾弘桥的总首王槐仁在《咏修苾弘桥七律二章》诗中写道：“溪流孔子叹途穷，野草堤花碧血烘”。《资阳三贤》：“孔子前往成周访问苾弘。……在政治、军事、文化和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孔子与苾弘的会晤，对他删《乐经》、著《春秋》帮助很大”。资阳县《王氏宗谱》的《白果林文著公祠堂图》中有“苾弘寨”“孔子溪”“忠义场”的记载。

清代院试的准考证和补考证

□ 彭 雄

清代的科举可分三级：第一级“小试”，又称“童子试”，俗称“考秀才”；第二级“乡试”，俗称“考举人”；第三级“会试”和“殿试”，俗称“考进士”。清代沿明制，府、州、县均设学校，学生称为“生员”即“秀才”，是最低一级的功名，要取得秀才的资格，必须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

院试是童试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被录取的新生通称“秀才”。院试一般由学校主持。监考的学政由皇帝亲自选派，到任之后，第一年举行“岁试”，第二年举行“科试”。

考场称为“考棚”，或称“贡院”。整个考试过程有兵丁严密监视。如有移席、换卷、丢纸、说话、吟哦等情况一经发现，即行查究，取消考试资格。

笔者所藏的这件清代《院试卷结票》，宽15cm、长23cm，竹纸印刷，上面填写有考生姓名、籍贯、年龄、三代履历。印有：“成都府华阳县正堂为科考事案奉府宪举行，于点名时执票领卷，该文章李陞荣各有凭据，如无卷票者不准入场，各宜遵照，毋得自悞，须至票者曾祖：廷先祖：玉兴、父：替文、业师：张德芳、里邻：屈云飞、互结：高绍聪、认保：张孝文、派保：彭宝杰；光绪年月日。”

准考证的第一行，写着“成都府华阳县正堂为科考事恭奉”字样。“华阳县”和“成都县”是当时成都府下辖的两个县，两个县的县衙门分别在今天春熙路两头，因此可以确定这个100多年前叫李陞荣的考生是个成都人。

此票左则有一行小字：“此票本童至廩保处过押，该童仍收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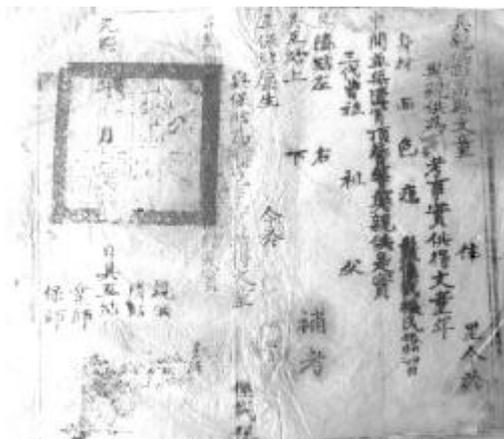
临点领卷备查无此票者，不得领卷，毋得自悞”。清代规定，考生必须有五人联保，还要有本县一名廩生作担保人，开具保结，叫做“认保”。廩保的责任非常重，所保内容有四个方面：1.身家清白。凡娼、优、隶、卒之子孙，均不得应试。妓女、戏子、皂隶（州县衙跑腿的子孙）、军中下等服役之人（不是士兵），这四种人称为家世不清，必须退役三世以后，始得与平民同等。2.不得冒籍。不是本县人而冒充本县来参加考试。3.不得枪替。就是请枪手代考。4.不得匿丧。父母之丧服未滿而出应试者称为“匿”。若被人检举，即除名扣考，而廩保要受处分。当时尚无照相，难以验明正身，只有廩保知道。廩保与童生一般是同乡或有亲戚朋友关系，对童生了解得很清楚，才敢给予具结签花押。

另有朱印“贰场”字样以及朱红大印一枚。可见上面的内容比现在的准考证要复杂得多，那个时候的准考证除了有考试的作用，还相当于一张“个人简历”或者“简要档案”。

除正式科考外，还有两种情况可以“补考”，一是“录科”，一是“录遗”。“录科”



清代院试卷结票（准考证）



光緒年間西昌縣『補考証』。

是指选送参加乡试的生员、贡生、监生的科考成绩名列三等，未获得参加乡试资格者、或者因故未参加科考者以及在籍监生、荫生、官生、贡生因名不列于本地学宫而不参加科

试者，皆须于乡试之年的7月，由学政主持的“补考”，考试录科，方能送考；另一种补考叫“录遗”，即经录科考试仍未能取得参加乡试资格者以及未参加录科考试者，可以再参加一次考试，录取者也准其乡试，各省“补考”人数皆有定额。为防止学生在补考时作弊、代考，就在补考证上用文字简要描述：此文童年多少

岁，身材是高或是矮？是胖还是瘦？面孔是白色、黑色、还是灰色？面部是否有痣？是否有胡须等资料都必须填写清楚，还要填写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人的姓名；要有“保人”“中间人”“亲邻”“业师”“保师”等5人联名具保结，证明这小文童并无冒充顶替之嫌，若其中一人违犯规定，5人均须连坐，而为之廩保者，黜革治罪，可谓相当的严格，看来古人要想作弊还有些难度。

（作者单位：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局）

省志编委调研成都、内江、雅安地方志工作

按照省委“走基层”工作要求，结合省志编委领导分片联系市（州）工作安排，省志编委班子成员近日到部分市州县开展了工作调研。

2月26日，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到成都市调研地方志工作。马小彬对大邑、崇州把修志工作纳入全县（市）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政府工作任务，落实工作机构、人员、经费，修志工作顺利开展给予肯定。希望以新修订的《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实施为契机，依法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在人员配备、工作经费上给予更多支持。县志办要制定工作规划，对志书编修和抗震救灾志编纂实行目标管理，加快进度；要逐步开展部门志编修；要善于挖掘文化资源，做好地情资源开发，为政府招商引资服务。要继续挖掘地方志资源，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村名镇、民风民俗，开发精品良志为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为社会大众服务；要加强地方文献抢救保护及数字化工作，为即将开展的全省地情资料信息平台建设打好基础。

2月20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罗亚夫到内江市调研地方志工作。他说，内江地方志工作开展有特色，工作思路多，工作活力强，在资政育人上下了功夫，对将死资料变活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他指出，在《内江市志》编修上，内江应当成立编委会，组织初审，然后报省、市两级政府审查；《内江年鉴》编修要保证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形式要美观内容要适用；县区年鉴质量

要提高；要抓地情资料编辑、开发、利用；工作中，地方志工作者要主动积极作为；史志馆建设要列入地方志工作规划，增加购书经费；希望内江在全省创先争优中要有作为，积极争取参加全国地方志评先活动；要推动当地部门志、行业志、乡镇志的编修，加强对市、县级志书的编修指导和管理。

3月4-5日，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孝平一行到雅安调研地方志工作。他指出，雅安市在五年内连续遭遇“5·12”“4·20”两次重大自然灾害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市委、政府及各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认识到位，保障到位；市县地方志工作部门积极服从、服务中心工作，在为抗震救灾提供地情基础资料，为灾后重建抓好地情资源开发利用，为发展地方经济深入挖掘地方文化资源，不断深化、拓展地方志工作内涵外延等工作中，认认真真存史，千方百计资治，尽心竭力育人，做出显著成绩。希望雅安市县地方志工作部门进一步争取领导重视和支持，用制度规范为事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和支撑；进一步履职尽责，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投身、服务灾后重建；进一步把握工作规律、掌握工作主动权，积极开拓新领域，在更高层次实现“有为有位”；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培训培养，做到“人才旺、事业兴”。

（罗一洋 辑）

成都僧众抗战期间义举史实解注

□ 张 强

整理并披露一段尘封于70多年前成都僧众在抗战最艰难岁月的义举史实，除了有对成都抗战历史文化中一些几乎淹没沉寂的点滴史实聚沙成塔补白的意思外，对于后人了解这座底蕴厚重的现代城市颇有益处。

一、民国时期成都军政界与佛教界的人缘关系

(一) “传奇都督”尹昌衡与一代高僧能海上师

四川与青藏地缘关系近，民国时期寺庙众多，在此文化环境下，不少川军将领及政商要人大多信仰佛教。1916年，原四川都督尹昌衡^①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相当于



尹昌衡

校长)时的部下龚缉熙受佛源法师启示，与人共同出资在成都少城的祠堂街建少城佛学社，并设有佛经流通处，除为信众提供经书外，还常请路过或安居于成都的高僧和居士讲经。龚缉熙从军较早，19岁时考入陆军速成学堂，小他3岁的川军将领邓锡侯去保定陆军军官学堂前亦在此校学习。1908年当13岁的刘文辉虚报年龄为16岁前去应考该校被尹教习破格录用的时候，龚缉熙已是云南讲武堂的教官了，而与之同岁的朱德恰为其在讲武堂时的学生。1917年护法运动正盛时，龚受刘湘之邀回川军任职。1924年春，已是少将旅长的龚缉熙在儿子刚满40天时，脱下军装在成都文殊院剃度出家，佛源法师为他取法名“能海”，不久从新都宝光寺贯一大和尚受具足戒。1928年起能海进藏修习密宗，拜拉萨著名僧人康萨格西学习密法，获密宗格鲁派宗喀巴大师第二十八代嫡传，并在上海、太原等处多次讲经。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能海上师率弟子从上海返回四川避难，因此他



能海上师

被佛教界公认是民国时代在汉地弘扬藏传佛教、显密同修共证菩提的代表人物。1949年底，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秘密潜往成都彭县龙兴寺^②并联名率部向毛泽东、朱德发出起义通电时，在此讲经的能海上师遂施以巧妙的掩护。1950年春解放军第18军进藏前，西南军政委员会派人通过能海的老师尹昌衡联系，拜见能海上师商谈藏区和平解放事宜。上师不仅介绍藏区宗教民俗，还当即给康、藏的上层写信引见，并派弟子隆果喇嘛随军进藏做翻译。建国初，朱德委员长专往北京广济寺看望住持于此的上师，愉快地回顾在云南如烟的



隆莲法师

往事，并仍以学生身份称之为老师。

(二) 邓锡侯将军与能海的两位高足隆莲法师和清定法师

能海上师在近慈寺讲经期间，每日听者甚众。其中有他唯一的女弟子、被誉为中国第一比丘尼的隆莲法师^[3]。隆莲法师俗名游永康，四川乐山人，外公是郭沫若的老师。她幼时自学国文、地理、数学，曾拜经史名家刘豫波为师，跟



邓锡侯

美籍牧师燕思恩的夫人学英语，又随悦西格西喇嘛学藏文。在1931年的四川省高等文官考试和1936年的省政府行政人员考试中隆莲均获全省第一。这位巴蜀才女还是民国时期省政府的第一位女文职人员，深受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4]将军的赏识。20世纪40年代初，她师从成都著名老中医陈云门，对《素问》等岐黄之术具有独特造诣，开诊行医。隆莲一心向佛，1941年6月，32岁的隆莲剃度出家，腊月初八日在文殊院受具足戒时，在场的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亲询其本意，知其出家意愿不改，遂大为感慨。之后，隆莲住持于成都爱道堂^[5]。1942年正式师从能海上师学习《大威德生圆次第》，此后，更以她深厚的底蕴，翻译了藏文《入菩萨行论广解》，参加了《汉藏大词典》的编纂，并协助斯里兰卡佛教界编撰英文佛教百科全书和《菩萨戒本》等佛经典籍。1960年，隆莲亲自主持了《四川省志·宗教卷·佛教篇》的编写，是四川地方志宗教史料收集和整理当之无愧的元老和专家。

能海上师的另一位高足，则是与隆莲同年在重庆慈云寺随澄一法师剃度出家的清定法



清定法师

师^[6]。清定俗名郑全山，浙江三门人。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进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深造，与军统戴笠、郑介民等曾为同僚。“七·七事变”后，清定担任第四战区党政军训练团上校训育处长。1939年他奉调陪都重庆，任国民党中央高级党政军训练团政训主任，官至少将。清定在重庆慈云寺出家时尚未受戒，据文殊院方丈、当时任文殊院知客的宽霖法师生前回忆，1941年冬天清定在成都昭觉寺受具足戒时，在场的邓锡侯、龙云等川滇将领以兄长名义曾力劝无果。1942年能海上师在近慈寺举行大威德金刚大灌顶，清定与隆莲法师此时成为了同门师兄弟，受能海上师之托翻译了大量的藏文佛经。此后5年间清定一直跟随能海



上师修习《大威德生圆次第》，在近慈寺、大慈寺和龙兴寺传经。有趣的是，能海的这位高足与隆莲一样，精通中医《灵枢》，1955年至1975年在他人生最灰暗的二十年中靠推拿针灸绝技为人治病，悬壶济世维持生计。

实际上，民国时期四川军政界与佛教界的深层关系远不止于此。如1925年就有传闻说时任川西北屯殖军总司令的田颂尧将一件宝物——明末崇祯皇帝之妃所绣的千佛袈裟——捐赠与了文殊院，受其影响，田的部下常到寺庙捐功德礼佛。刘文辉1933年兵败退至西康，夫妇俩到阿坝藏区的金川广法寺皈依，期间常请喇嘛到府宅讲经，其经堂中的鎏金佛龕现在还存于西南民族大学，是研究刘文辉与藏传佛教的重要文物。

二、成都僧众对抗战所做的贡献

据李卓夫^[7]老先生生前回忆，1937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来成都，在少城公园参加成都各界抗日救亡献金大会时，亲眼目睹了梨园弟子和川剧名角捐黄金，僧众捐资，商铺小贩义卖，妇女捐首饰，市民和农民捐粮，流落街头的残疾人、乞

丐甚至青楼女子都捐出钱物的感人场面。抗日救亡献金大会召开前，戏剧名家在会场外搭台义演《岳母刺字》《八大锤》等剧目。会后，昭觉寺、文殊院、大慈寺等各寺僧众相继举行庄严的和平、护国法会，期间募集了不少经费。李老还记得当时听到邓锡侯将军在少城公园向刚从西昌率47军赶到成都的李家钰军长介绍说坐在台上的两位和尚中有一位“是刚从江浙才回近慈寺的大和尚，我们是老朋友。”笔者根据时间和人物关系推断^[8]，这位“刚从江浙回近慈寺的大和尚”极可能就是指能海上师。

和平法会后不久，前方传来消息说川军官兵们没有御寒的棉衣^[9]，部队到达河南博爱车站时，已是冰天雪地，马匹冻得迈不开步，要在站台上烧火取暖才能走动。又听闻蒋介石许诺补给的军需后来也说话不算数，一时间民众气愤难平。近慈寺、昭觉寺的僧侣和广大信众闻讯随即成立了后援会组织捐献冬衣棉被，送到47军驻成都办事处处长陈启奎手中。

1944年夏，二十二集团军经整编后的所属部队再次回川募兵时，观音阁的道友和文殊院、爱道堂的许多僧众将禅房和寺庙里打坐的蒲团棕垫全部

都拆下为前线改做蓑衣，所有僧众就寝或打坐时都改用谷草做垫，并请来一些居士打棕草鞋送往部队。

1943年前后，隆莲受能海上师托，在铁象寺建比丘尼道场时，这里是一所保育院，住着许多外省来的保育生，也就是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的孤儿，由宋庆龄先生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慈善机构收养起来转送到四川大后方，由保育院负责抚养和教育。隆莲法师和信众曾经在保育院最困难的时期，多次将募集到的冬衣送到铁象寺。

1944年5月底，在河南陕县壮烈殉国的李家钰将军灵柩由川陕公路回川安葬，他是继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官张自忠将军阵亡后中国军队第二位捐躯的集团军总司令官。噩耗传闻，全国爱国人士为之含悲而沉痛。将军的遗体在昭觉寺特意停留了整整七天，能海上师及弟子清定法师皆率僧众同将军的姐夫冯德成等亲属一道为将军守灵。6月8日，李家钰出殡仪式在成都举行，李家钰将军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邓锡侯（时任四川省主席）亲自主持，僧众开示、诵经超度。追悼会后，隆莲法师委托一个居士朋友（隆莲法师当时回乐山

了)把其自制的一大坛去腐生肌散通过邓锡侯将军转送给前线将士,以表寸心。据说当时成都的《新新新闻》报社对相关细节均有报道,后来孙震^[10]将军还特意向能海上师致信表示感谢。

三、史海钩沉后的感叹

这些如沙般沉寂于宏大而久远历史中的细节,不管今天的人是否还有记忆亦或知晓,历史,它就在那里。与那些史诗般壮阔故事相比,成都僧众所做的义举或许微不足道,但那些“细沙”和“流水”,是我们记忆中不能忘、也不该忘的根。

参考文献:

[1]尹昌衡(1884-1953),字硕权,四川彭县(今彭州市)升平镇人。辛亥革命时期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四川军政府军政部长。1911年12月因率部平息清廷残余发动的成都兵变,生擒赵尔丰并将其斩首示众,遂被成都军政各界推为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1913年与云南的蔡锷一并被袁世凯诱骗至北京遭软禁。蔡锷发动讨袁护法运动后,袁世凯于1916年死亡,尹昌衡被黎元洪特赦。回到四川的尹昌衡从此脱离军

界,淡泊著书。1949年后,尹昌衡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病故于重庆,享年69岁。

[2]龙兴寺:位于今成都市彭州北门,始建于东晋义熙年间,距今1300多年历史。寺内供奉有斯里兰卡国王赠送的佛舍利及《贝叶经》,还有一代高僧能海、清定上师倡导建成的仿印度加尔各答金刚宝座塔、舍利塔各一座。

[3]隆莲法师(1909-2006),成都爱道堂住持。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副会长;四川省佛协秘书长、会长、名誉会长;成都市佛协名誉会长;四川尼众佛学院院长。

[4]邓锡侯(1889-1964),字晋康,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抗战时期任二十二集团军司令长官兼45军军长,1938年初晋公奉调四川主持抗日大后方的军政要务。

[5]爱道堂:位于成都文殊院旁的通顺桥街,民国元年(1912年)由古圆觉庵改为十方爱道念佛堂,是四川第一所十方尼众丛林。庵内供奉观世音菩萨,隆莲法师圆寂后其灵塔和骨舍利亦安奉于此。现任住持为隆莲法师的高足照心法师。

[6]清定法师(1903-1999),成都昭觉寺住持。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成都市政协常委;成都昭觉寺佛学院院长。

[7]李卓夫(1914-2006),抗战时任第四十七军104师312旅624团上校团长,参与过长治战役。晚年时为民革成都市委社联副主任、民革成都市青羊区支部成员。

[8]此推断得到了能海上师弟子、现年110岁的蒲江黄宗寺云澄嘉措法师的旁证。

[9]据李家钰将军之子李克林先生(四川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回忆,川军1937年9月出发时,许多部队官兵们仍穿着单薄的灰布军装,有的还穿着短裤,士兵们都穿草鞋。

[10]孙震(1892-1985),字德操,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抗战时期任二十二集团军代司令长官兼41军军长,与邓锡侯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1938年初升任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长官。1929年起先后创办了成都树德第一小学、第二小学、第三小学和树德中学。

(作者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都市副主委)

1946年7月，云南省工委接南方局通知，调马识途立刻回四川工作。他顺利到达重庆，到四川省委（中共中央重庆分局，统管西南各地的党组织）报到，省委决定派马识途到成都担任成都工委书记（成都工委原名川康特委，管辖范围包括成都市、川西区、川南区、雅安、乐山一带及西昌地区）。1946年9月，马识途平安到达成都后，居住在柿子巷六号一座破败不堪的小院子里，以在华西协中教英语为职业掩护，着手抓成都市的学生运动工作。他深入各学校与党组织建立联系，要求大家转变作风，深入群众作工作，着重做好争取中间分子工作，放手发展党的外围“民协”（民主青年协会）组织。

1947年初，国民党当局强迫驻在重庆的以吴玉章为首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撤退延安，其机关报《新华日报》被查封。成都工委决定由马识途领导和筹办地下报，并取名为《XNCR》。《XNCR》是一种与中共重庆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几乎同时出版的党的地下报纸，不同的是：《挺进报》因印刷发行量大和错误地执行上级布置对敌开展攻心战而暴露，更由于叛徒的出卖而遭到敌人的破坏，小说《红

马识途与《XNCR》



1947年的马识途，这是马老在地下工作时期唯一一张照片。

岩》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艺术的叙述，所以闻名于世；而《XNCR》则因采取了灵活多变（更换名称等）的办法，比较好地隐蔽到1948年底，直到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叛变才被迫悄然停刊。所以，除了当年《XNCR》的读者，这个地下报纸已鲜为人知，因此很有必要作一介绍。

1946年底，马识途从王宇光家里取走了中共南方局交下来隐藏的电台，这部电台因南方局开通了雅安川军刘文辉部里设立的秘密电台，所以一直没有启用。1947年3月初，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后，川康特委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了，《新华日报》的消息也被封锁了。为了让特委下属的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能听到党中央的

声音，了解解放战争的形势，并把这些真实的消息传给群众，马识途决定办一份小报，但消息的来源只能依靠收听延安（后来是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稿。于是，马识途临时自学无线电的有关知识，试着将这部南方局交下来隐藏的电台改装成了一部收音机，专门收听新华电台播发的广播稿，并将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XNCR作为油印小报的报名。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11点钟以后，马识途在柿子巷自己的家里，头戴耳机，持笔伏案，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抄录广播的通讯稿；然后马上刻蜡纸，凌晨3点钟左右油印，一直搞到5、6点钟才结束。早上，便把油印好的《XNCR》拿出去分发到各个组织传阅。马识途还动员自己

上中学的弟、妹、侄女业余时间参加《XNCR》的工作。

《XNCR》创办之后，马识途因工作繁忙，《XNCR》的工作量大，就抽调川大党组织的负责人王琴舫担负这项工作。王琴舫，女，后改名王放，1947年7月任成都市工委委员，1948年初任成都市委委员，负责中学区委工作。

办地下刊物是一项极为秘密和危险的工作。一天晚上，马识途和王琴舫正在油印，忽然发现窗口外面有人盯梢，天一亮他们就提起油印机转移，虽然摆脱了盯梢，但却一时无处可去，就跑到蒲华辅家中。蒲华辅见他们提着油印机到来，一改平日说话时的细声细气，对马识途大声训斥：“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马识途解释到：“还有两个钟头就印完了，然后马上拿走。”蒲华辅不容商量地说：“不行，一分钟也不行！非马上走不可。”看到蒲华辅恐惧的样子，王琴舫批评说：“老马搞这个刊物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你不应该……”“住口！”蒲华辅指着王琴舫训斥，“你没有资格和我说话！”马识途见状气愤地说：“是嘛，油印机放在我那里一两年了，你都没说危险。拿到你这里暂时放两个钟头，你就受不

了。”这时，蒲华辅稍微冷静下来，开始以违反纪律为由批评马识途。马识途见蒲华辅仍然说不通，就与王琴舫提起油印机离去，将油印机拿到华西协中他的宿舍里冒险印完、发出。

《XNCR》刊载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和党中央的文件、时事评论以及毛主席以新华社发言人身份发表的声明和文章，如《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土地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XNCR》经过秘密的传递渠道，在党、“民协”组织内和一些进步群众中流传，发挥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使很久没有听到党中央声音的人们倍受鼓舞。然而，没过多久，国民党特务发现并注意到了《XNCR》这个地下报纸，特务机关下了死命令，要求几个月内一定非破获不可。马识途得知这一敌情后，与王琴舫研究，决定不搞阵地战而搞游击战，即采取变换小报名称、纸张、油墨的办法，名称有时叫“川大时事研究会”，有时叫成华大学的xx会，有时又叫其他大学的xx社，每一期小报都换个名称；纸张的颜色有时用黄的，有时用红的，有时用白的；油墨的品种和颜色也是经常变换。表面上看，《XNCR》似乎

失了，监视小报的特务也被这种游击战的假象迷惑了，后来就给上司报告说：《XNCR》没有活动了，只发现了川大搞的零零散散的宣传品。

《XNCR》采用变换名称、纸张、油墨的游击战不久，马识途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同学、共产党员刘国鋐来成都，他们见面后，虽然双方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不谈组织问题，但却交流了办地下报纸的情况。刘国鋐听马识途介绍《XNCR》打游击战的方法后，讲了重庆也办了个地下报纸叫《挺进报》，已经出了若干期，效果非常好。马识途认为《挺进报》不应使用固定的名称，这样做是打阵地战，容易暴露，并说：“办报是内容号召群众，不是报纸名称号召群众，何必强行和敌人硬拼呢？”但是刘国鋐并没有听进马识途的意见，而且这时刘国鋐也不再与《挺进报》发生联系，所以这个意见没有被《挺进报》采纳。

《XNCR》是继《新华日报》撤离后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和前线胜利消息的秘密刊物，继续在四川地区保持中共的舆论优势，对鼓励士气、指导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该刊坚持到1948年停办。

(本刊综合)

廖寅政绩文绩述略

□ 丁禹强

“升官刘之协，败官刘第五”，是邻水民间流传的俗语，是家乡人民对廖寅为官一生的朴素总结。廖寅先祖是明朝德庆侯廖永忠次子廖德有，为大理寺少卿，随汤和伐蜀，迁居邻水。廖寅生于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歿于道光五年乙酉（1825），字亮工，号复堂。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举人，历署布政使、按察使、两淮都转等职。廖寅为人冰清玉洁，为官鉴空衡平，中年晚达，政绩卓著。从政之余，热心著述、刊印书籍，于方志贡献犹勋。

一、政绩述略

《清史稿》载有《廖寅传》，其生平、政绩较为简略；道光十四年（1834），清代大理寺正卿、邻水人甘家斌亲自为廖寅作《两淮都转廖复堂先生传》，记载廖寅生平、家世、政绩颇详，可补《清史稿·廖寅传》之不足，现概述如下：

功名晚达，仕途顺畅。二十三岁当秀才，二十九岁中举人。四十五岁到北京参加大挑（按照清乾隆十七年定制，三科不中的举人，由吏部据其形貌应对挑选，一等以知县用，

二等以教职用。每六年举行一次，意在使举人出身的士人有较宽的出路，名曰大挑），获得一等，题补河南叶县知县。在叶县任职六年，以“实心行实政”“裁革陋规，慈祥割切”，对白莲教徒“擒其首恶，全活甚众”，深受百姓拥戴。嘉庆三年（1798）三月，白莲教首王聪儿进犯叶县，杀保安驿丞，廖寅亲临追剿，抚恤死难。六月，在县境擒获教匪刘之协。

超迁牧守，安定赣南。嘉庆六年（1801）九月，廖寅以擒获刘之协功，擢升镇江府知府，在任期间督办河工，疏通运河，“徒、阳士民，大食其利”。之后，廖寅署理常镇通兵备道，兼督扬粮、江防两

厅，“分立章程，商旅讴歌。”

嘉庆八年（1803）十一月，廖寅奉旨升授江西吉南赣宁兵备道，督理赣州关部，“洞悉民俗，多方化道。而榷务只取正税，示之以宽。故胥吏不得缘以为奸，商贾乐之。”

嘉庆十一年（1806）署理江西藩篆，“晓大义，明厉害，惩首恶”；安远煽乱，廖寅“单骑往谕，解散党与，耆民等缚其魁以献”，境内复安。在赣九年，“大旨以正人心端风俗为首务，而慈爱之意，赣民实受无穷之福。”

实榷盐课，襄赞军务。嘉庆十六年（1811）二月，廖寅升授两淮都转，十八年，获理盐政。上任伊始，巡查通州、泰州、海州各盐场，“恤灶



丁，治私泉”，核定盐价，盐课渐增；筹办军饷，襄赞军务。嘉庆二十年（1815）正月，因其子错捕滑县倡乱匪首“坐失察降调。”次年三月，廖寅入都引见，上念其擒刘之功，“得捐复道员如例”。

二、校勘《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是中国最早的方志之一，也是唐代以前方志之仅存者。它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具有极大价值，是研究巴蜀地区历史、考古和西南民族，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现存《华阳国志》传世版本很多，清嘉庆十九年（1814）廖寅所刻的题襟馆本，为其中最有价值的版本之一。《四部备要》中的《华阳国志》就是用这个版本排印的。

嘉庆十九年甲戌，廖寅在南京借抄孙星衍家藏宋本《华阳国志》，先后邀请元和顾广圻、江宁顾槐三为之校勘，又雇当时著名刻工刘文奎兄弟就所居题襟馆镌刻而成，世称题襟馆本。此本校勘态度审慎，见解精辟。其优点有四：一是此本以所抄宋本为依据，又引据群书对原文多所订正；二是此书原文一依宋本，校语夹注行间，订正虽多，未曾改窜原本，读者循文及注，可知原书究竟；三是校勘者为大学者，其所订正，虽多为臆测，但以他本比对皆正确无误；其校正地名的错字，皆发前人所未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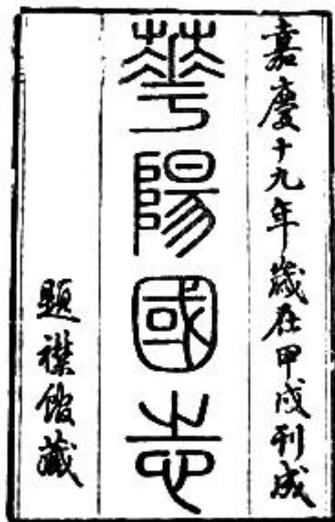
四是指出旧刻之脱简数处，并列引他书，提出考订线索。

《华阳国志》至南宋嘉泰间，已颇残缺，后经明人窜乱，舛误特甚。廖寅题襟馆本虽未能复常璩旧观，但颇订其讹，刻版精致古雅，当代著名学者整理《华阳国志》，皆采用此本为工作底本。道光《邻水县志》评论（廖寅）“尝刊桂林陈相国四种遗规，示后学立心制行之准；晋常璩《华阳国志》，以识遗风高躅之徽。”言简旨切。《华阳国志》作者常璩为崇州人，崇州市政府为纪念这位文化名人，出资并选定题襟馆本《华阳国志》为底本，原件影印出版，作为崇州市政府礼品书。廖寅去世几近两百年，《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等一批专著相继出版，充分肯定了廖寅的成绩。

三、文化贡献

廖寅生于没落世胄之家，长于康乾盛世，成于乾嘉时代，享年七十五岁，可称高寿而有善终。其为官有政绩，为人有令名，为学有成就。少年时期受到祖、父亲自教诲，中试以后，“学必穷源，词皆立干，而抱嗜书之癖。”四十五岁出仕以后，“笃于文学之士，每公余则手执一编。及归里后，尤研悦无辍，灯下据案细书，不以为劳。尤好为人讲述义理，娓娓不休。”其文化贡献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著书立说。江南文化名



邦，古迹众多，文风郁盛。寅在扬州，与祭酒吴谷人诸公联韵于瘦西湖上桃花庵，结希贤诗社，皆凭今吊古，兴往情来之词，卓然可称于世。在淮著有《自述百韵诗》。在江西与进士甘煦堂等渡漳水而西，登通天岩，步王成公原韵。其学问渊深，尤邃于易，综贯汉宋诸儒之说，以朱子莱子为宗，自为笺注，已有成书与诗撰述，尚未及雕版。著有《震复堂制义》行世，惜不得见。

编纂方志。嘉庆二十一年（1816），廖寅卸任后回原籍居住。得到邻水知县吴秀良邀请，主持编纂《邻水县志》。后继三任邻水知县李嘉祐、王尚锦、陈嘉谟亦力信之，让廖寅总裁其事。寅延请教谕、典史、举人、贡生三十余人，耗时六年，于道光元年（1821）十月成书四卷并予刻印，现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有全套，为乡邦文化建设作出极大贡献。



刊刻古籍。嘉庆十八年(1813),廖寅奉命纂刻全唐文集。延聘祭酒吴谷人,学士吴山尊,廉访石琢堂,观察孙渊如,太守伊墨卿、汪剑潭、洪桐生、张船山纂校,皆乾嘉名士,刻成一千卷,所费良多。

倡建书院。廖寅壮年入仕,躬逢康乾盛世,而乾嘉学派正值鼎盛时期。乾嘉学派不只研究古代文献和文献考据,也重视创办书院、传授学人,形成理论和社团体系。廖寅深受其学术思想的影响,每任一地,都十分重视书院建设和教学实践。在叶县,廖寅“修葺书院,捐廉俸,增膏火,与员额延名师训课。”“于赣之濂溪书院,及两淮之安定、梅花书院暨孝廉堂皆然。”嘉庆三年(1798),应聘入文闱,充同考官,得士最盛。凡书院所培植,赣州如周作辑、萧名扬、阮文藻,扬州如李周南、吴清皋、唐敦培等二十余人,“相继登贤书、成进士、得曹部、入词林,取鼎甲,传为盛事”。“迨至回籍,仿范文正义田之法……买置义田,得谷三百担”,“以一百担入义学,赈贫士之寒苦”,创办绍庭书院。“并以平生精力,购藏之书,凡一万零三卷……置城内文昌宫,听人抄览”,成为邻山书院的主要藏书。

四、乡邦文物

在廖寅故乡邻水县,曾经

造有两淮都转盐运使廖复堂神道碑、都转廖公寅墓。在解放初期仍保存完好。

两淮都转盐运使廖复堂神道碑:在邻水县城南关外,即今南门外乌龟碑街道口。乌龟驮石造型,上有铭文:皇清诰授忠义大夫资政大夫都转两淮盐运使司护理盐漕察院兼理兵备道赴叶县知县后超升镇江知府廖公复堂神道碑。道光八年所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扩建汉渝公路,石碑被毁。

都转廖公寅墓:在城南八里白果园。山门前立有墓志铭,刻石文字模糊不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坟茔、石刻均被毁。

目前,国内学术界还发现下列文献记载有廖寅生平事迹:《中宪大夫候选道前两淮盐运使廖公墓志铭》,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十,光绪二十年刻本。《中议大夫两淮都转盐运使廖公墓志铭》,姚文田《邃雅堂文集续编》,道光八年刻本。《两淮盐运使廖公神道碑铭》,朱琦《小万卷斋文稿》卷二十二。《候选道前两淮运使廖君墓表》,陆继辂(代振威将军安徽巡抚长沙陶澍作),《崇百药斋三集》第十二,道光八年刻本。以上四个文献疑为清代著名学者、官员为廖寅所写,惜未见原文,不能臆断。

此外,台湾学者文守仁先生曾见《江西通志》《赣州府志》,以及恽敬子居《大云山房全集》中有关廖寅的史料,写有《廖寅其人其事》一文。

作为封建时代的正直读书人,廖寅怀有积极用世的政治愿望,希望改变现实,施行仁政,利人济物。从政二十年,赋役征收“念民膏”,刑名出入“得民情”,工役兴作“惜民力”。他仰慕先贤,赞扬利民爱物的贤臣,反对聚敛剥削的奸佞,殄灭以武犯禁的暴徒。《邻水县志》认为其“天性和乐,胸无城府,恂恂然良善之士……其仁且勇者也。”堪与北宋政治家张齐贤比美。

廖寅非常重视子孙的教育,善于因人施教,因材施教。长子廖思芳少时不喜读书,有勇力,“居乡治团练,从军数有功,官至江苏候补道。在叶县手擒刘之协,名闻天下。后以捕刘第五获罪下狱,寻赦之地。”次子廖思庄,候选同知,有文才,曾参与采辑县志。孙十四人,长廖均,庚午(1810)顺天举人,官江南盐法道;次廖圻,癸酉(1813)顺天乡试取誉录,议叙河南布政使司经历。其子孙至今已在邻水繁衍十余代,蔚为大族,其泉下有知,庶几无憾矣。

(作者单位:四川邻水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德阳山明水秀，地灵人杰，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极其丰厚。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德阳这块丰饶的土地上，先后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散文大家。

诗文革新先驱苏舜钦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四川中江人。善诗能



苏舜钦

文，是宋代诗文革新的先驱。他的开拓创新精神，深受同时人的称道。大家肯定他“挽杨刘之颓波，导欧苏之前驱。”他不仅诗写得很有韵味，散文也别具一格，写得清丽而有情致。他官位不高，但胸怀报国壮志，常常不顾个人安危，秉笔直书，为民请命，是一位骨鲠忠贞之臣。他大义凛然，先后奋笔写出了《火疏》《论西事状》《乞用刘氏兄弟》《上范公赞政书并咨目七事》等一系列振聋发聩、击浊扬清的好奏章。为表彰他的耿耿忠心，他的故乡四川铜山（今中江县广福镇）的父老乡亲特地竖立“苏公笔”来纪念他。

理学大师张栻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四川绵竹人。南宋抗金名将张

德阳历史上的散文大家

□ 姜 诗

浚之子，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贤臣和学者。是我国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他幼承家学，品学兼优；居官清廉，主张修德立政，任贤养民；崇德树人，乐于治学。后辞官不做，潜心教育。1165年，他应邀至湖南长沙，主讲岳麓书院。在此期间，推崇仁义，倡导纲常，以弘扬儒学、传承中国文化为己任。在教学中，主



张栻

张敬天法祖，推陈出新，不遗余力地为国家培养人才，成了湖湘学派的主要传人。是一代远近知名的学宗，同朱熹、吕祖谦齐名，时人对他们有“东南三贤”的美誉。他的老师胡宏很赞赏他，说：“圣门有人，吾道幸矣。”朱熹也撰文称他：“名质甚敬，学问甚正”，“学之所就，足以名一世。”他一生著述甚丰，有《南岳唱酬序》《仰止堂记》《楚汉争战》等文章存世，他的众多著作，最后编定成《张南轩公全集》。

一代文星李调元

李调元（1334—1802）字羹堂，号雨村、鹤州、童山等。四川罗江人。清代知名学者、诗人、卓越的文艺理论



李调元

家。在罗江，他们家“科第冠巴蜀”，有“一门四进士，兄弟三翰林”的美誉，同彭端淑、张船山并称“清代蜀中三杰”。他是一位百科全书类型的人物，倾注一生心血，编撰成规模宏大、集各类图书163种的大型丛书《函海》。《函海》共40函，852卷，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巴蜀文化的宝贵资料。他是“书香留百代”的大学者，孙桐生很敬

重李调元，说他“诗文敏捷，天才横溢，不假修饰。”称赞他“西蜀多才君第一。”著名学者、诗人袁枚对李调元及《函海》评价极高，说“正想其人如白玉，高吟大作似黄钟，童山集著中山业，函海书为海内宗。”可看出李调元及其作品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影响力很大。

青年才俊杨锐

杨锐（1857—1898）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清末维新志士，是戊戌变法殉



杨锐

难的六君子之一。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博览群书，精通典籍，有经世济民之才，写得一手好文章。1874年，时年27岁的杨锐应童子试，考中秀才，张之洞阅卷时发现杨锐的文章很有文采，称得上字字珠玑，对之大加赞赏，视为蜀中奇才，赞其：“才英迈而品清洁……颖悟好学，文章雅贍”，是“蜀士一时之秀。”1875年，尊经书院在成都建成，杨锐入院深造，与廖季平等五人同为张之洞的得意弟子，受

到张之洞格外器重和关爱，享有“蜀中五少年”的美誉，为“五少年”之首。1885年杨锐中了顺天乡试举人。随即应邀进入张之洞幕府，给张之洞佐政。张对他赞赏有加，视之为一块“无瑕美玉”。在此期间，张之洞上呈皇帝的奏疏，大都出自杨锐之手。老将冯子材抗击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后，向朝廷呈献的捷报《广军援桂奏稿》，也由杨锐执笔，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篇意义十分重大的历史文献。杨锐的文章，记事翔实细致，议论准确精当，文笔生动流畅，时有传神之笔。1889年，他考取内阁中书，获章京记名，参加纂修《大清会典》书成，晋升侍读，加四品衔。1895年，杨锐在北京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筹划的“公车上书”并同康有为、文廷式一起在北京组织旨在振兴中国的“强学会”，1898年又在四川会馆创建“蜀学会”以推动变法维新。1898年7月20日，杨锐经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被光绪皇帝任命为军机章京，参预变法新政，成为光绪最信任的“军机四卿”。9月，变法失败，杨锐等六君子以身殉职，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以后安葬在绵竹南轩中学侧边。著有《杨叔峤诗文集》《隋史补遗》《晋书注》等。

才思敏捷的李鸿裔

李鸿裔（1831—1896）字眉生，号香岩，中江杰兴乡人。晚清名书法家和诗文家。他风流倜傥，才气过人，谈吐风趣，诗文俱佳。21岁中举，曾任兵部主事。应邀到湘军大本营给曾国藩出谋划策，参赞

军机，由于文思敏捷，深受曾国藩的器重。湘军攻克南京后，论功行赏，李鸿裔出任江苏按察使。但他是个至情至性的人，一生追求闲适自在，不愿被官位所束缚，36岁时以耳疾辞官不做，寓居苏州沧浪亭旁，交朋结友，以诗酒自娱，自号“苏邻”，光绪十一年卒。他在给曾国藩佐政期间，很多文书都出自他的手笔。这些文章文采焕发，生动传神。

博学鸿儒张邦伸

张邦伸（1737—1803）字世臣，号云谷，广汉北郊张家后营人。他勤勉好学，博学多才，29岁参加大挑盛典，夺得一等，先后任辉县、光州、襄城和固始知县。他居官清廉，卓有政声，深受百姓爱戴，评价他“政通民和，案牍清简。”罗江才子李调元对张邦伸赞赏有加，称赞他“待人以忠以信；处事必敬必恭；为官实心实政……”他是清代中叶“广汉三张”之首（另两人为他的儿子张怀渭、侄儿张怀泗）。当年翰林院学士杨蓉裳来四川主持锦江书院，以文会友，当其阅读张氏父子的文章诗词后，不禁拍案叫绝，啧啧称赞，说“三张”是“博览古今，文逼韩苏”，“宋有三苏，今有三张，都是了不起的英才呀！”张邦伸的文章收录在“云谷文抄”四卷中。主要的文稿有《人物志》《读书札记》。他的著述之多，为汉州第一人。

（作者单位：四川德阳市委党校）

成都东大路——逐渐逝去的古道

□ 朱成文

成都的东大路，是成都沟通川东方向的必经之路，最早在蜀汉成型，史称蜀巴大道。魏晋南北朝时期，驻防武康郡（今简阳）的车骑大将军强独乐等11位将帅为称颂北周文王宇文泰平定南方，此道得以重新开通，特意在龙泉驿区山泉铺东面的显益之岗大佛寺为其建记功碑（即北周文王碑）。唐代正式将此道作为官道，北宋诗人文同所撰《和提刑度支王店鸡诗》，其中有“王店有邮吏，养鸡殊可笑”之句，“王店”即现在的龙泉镇，说明宋代龙泉驿已经是政府通邮的重要通道了。

唐宋时期，东大路已经比较繁华了。证据有三：一是山泉铺东面半山坡的唐三教场及石佛寺自唐宋至近代一直有文人题刻，尤以唐宋居多；二是从东大路上龙泉山不远有宋代修建的“少休亭”；三是宋代袁辉的《通惠桥记》，对当时的繁荣景象记述最为生动，说

当时的东大路是“商贾轮蹄、往来憧憧，不减大郡”。

至明清，开始普及驿道，东大路就是从锦官驿至龙泉驿再到阳安驿的正线，直线距离最近，人员和消息往来最便捷，经过的地方有：得胜场、沙河堡、簧门铺、大面铺、界牌铺、龙泉驿、山泉铺、柳沟铺、南山铺、石盘铺、赤水铺、九曲铺等。根据明天启年间冯任修的《成都府志》（当时简州隶属于成都府）的记载：龙泉驿，早夫六十名，该银四百三十二两；号衣三两六钱；厨子六名，该银四十两二钱；马四十五匹，每匹三十两，共银一千三百五十两，供应银二百四十两，每年共二千

六十八两八钱。其总规模在成都府22个驿站中仅次于成都城外的锦官驿，无论人数还是马匹都多于地处简州州府的阳安驿。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东大路上有大量过往的官员和需要派发的文件。

由于成都历来就是一个消费城市，很多川东的物资要运往成都，为省力，客商往往愿意走水路。东大路北支线作为商道开始发达起来，金堂县五凤溪因处在沱江旁边，成为客商卸货的重要港口，很快繁华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洛带镇成为成都东门最大的商品中转站，这才有了民间谚语“运不完的五凤溪，搬不空的镇子场（洛带），装不满的成都府”。





洛带古镇照片。拍摄时间：1901年，拍摄人：德国塔瓦塔娃。

图片展示的就是清朝末年的情况，说明当时洛带街道已经比较成型，街面中间路面较完整，而街道两边坑坑洼洼，是因为独轮车长年碾压所致。



东大路在龙泉驿区境内的路段，胡开全2012年拍摄。

这里的搬不空，是指东山上的柴禾，以及川东输送来的油、盐、糖、烧酒等物资。因为镇子场交易规模较大，所以有“成都东山五场镇之首”的称号（另外四个是龙潭寺、西河场、石板滩、廖家场）。由于五凤溪到镇子场基本上是山路，崎岖不平，所以客商只有靠肩膀挑运货物。而镇子场到成都府的路面相对要平坦、宽

敞些，客商可以挑着货物进成都，也可以用独轮车把货物运进成都。

此外，还有一条线路是从成都府出发，经过洪济桥（九眼桥）、新店子（新兴镇）、柏合寺，再翻长松寺到贾家场，叫东大路南支线。柏合是传统的东大路南支线的重要节点，从这里往东翻龙泉山到贾家、简阳，往南可到达仁寿（即所谓陵州古道）。

民国17年（1928），成渝公路成简段建成通车后，东大路上这种传

统肩挑背磨的运输方式，逐渐被滚滚的汽车车轮所替代，镇子场（洛带）的经济地位开始衰退，逐渐被龙泉驿赶超。如今，洛带古镇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龙泉街道的发展日新月异，传统的东大路遗迹也所剩不多了。

据调查，成都东大路上保存得最好的是山泉铺至茶店子的一段古道，至今仍有山人行走其间，步履如风。

总之，东大路在古代是比较繁华的，既是官府传递文书的重要通道，也是民间货物往来的重要通道。

为了展示明清时期成都东大路的大致情况，胡开全同志认真查阅有关史书和地方志书，并认真进行田野调查，绘制出成都府到简州的草图。后聘请成都地图出版社专家万邦先生画出了《明清成都东大路示意图》。



川西平原的独轮车，又名鸡公车。拍摄者：美国《生活》杂志记者卡尔·迈当斯，拍摄时间：1941年。

（作者单位：四川成都龙泉驿区档案馆）

南怀瑾(1918—2012),当代著名学者、国学大师。

1937年5月,南怀瑾先生来到四川,旋即抗战爆发。1939年秋,南先生自任大小凉山垦殖公司总经理兼地方自卫团总指挥,屯垦戍边。其后,在“中央军校”研究班第十期兼修,并任教官。期间,曾在华西坝金陵大学研究社会福利学,以期服务社会大众。每逢假日闲暇,芒鞋竹杖遍游蜀中名山大川,拜师访友,并于1942年在灌县(今都江堰市)灵岩寺结识一代禅门宗匠袁焕仙,成为“维摩精舍”首座弟子。1947年离川,寓居四川达10年之久。南先生对四川感情很深,所言及的四川往事可以看作一帧民国时期四川的风土人情画卷。

南怀瑾：一个文人必须到过四川 一生才不会有遗憾

□ 王国平

四川人非常讲义气，真痛快

王国平：南先生在四川呆了很多年？

南怀瑾：我在四川呆了十年，主要在成都一带活动，先在灌县灵岩寺，然后又到峨眉山闭关。四川、重庆我都呆过，川西、川南、川东、川北都去了很多次。西康，云南、贵州的边境都是出土匪的地方，我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土匪头子……

王国平：在四川生活这么多年，您怎么看待四川文化？

南怀瑾：四川文化一大景观就是，喝喝茶，打打麻将，摆摆龙门阵。

王国平：您怎么看四川人

的性格？

南怀瑾：四川人非常讲义气，真痛快、真义气、真耿直，讲的袍哥大爷，讲的是：你哥子，我兄弟，你不吃，我愠气。四川人说话爱骂人，但是你骂他，他也会不生气。

王国平：您还记得四川方言吗？

南怀瑾：四川方言太有意思啦，四川人很幽默，而且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歇后语，连抬滑竿的都有一套。比如前面抬滑竿的师傅报一声：“天上一个亮”，后面的就说：“地下有个水幽幽”。前边的说：“左边立起大”，后边的说：“让它不要说话”。前边的说：



南怀瑾先生

“下下坡”，后边的说：“慢慢梭”，意思是下坡的时候，不能走快了，要慢慢儿地梭下去。比如叫花子要饭，遇到有狗对他叫，他就会说：“黄狗白犬你莫咬，你我前生命不好”，意思是，你叫什么，我

们都是前生做了错事，我变叫花子，你变狗，都命苦。我以前记了一大本子四川人的歇后语。现在老了，都忘了。

四川人也喜欢民间文学，我们以前在川南乡下旅馆，幺店子，一碗豆花，一碗海椒，门口挂个旗帜：“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也有小二就会站在喊：“未晚先投二十八（宿），鸡鸣早看三十三（天）”的歇后语。哎呀，四川人太幽默了。还有人说：“半夜起来贼咬狗，拿个狗来打石头，从来不说颠倒话，阴沟踩到脚里头。”

四川人爱摆龙门阵

王国平：摆龙门阵是四川的一大特色。

南怀瑾：四川人爱摆龙门阵啊。我在四川的很多老朋友，都会摆龙门阵，听的故事很多。青城山当时有一个传说中的神仙叫周凌霄，据说会飞剑，死了，他女儿还在。还有人告诉我：“我给你介绍一个师父，

青城派的，姓徐。”那个师父叫徐庶，就是三国演义里的那个徐庶，我一听就不去了。那个时候流行飞剑，你们不要笑，剑术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川、康、渝一带这种神话非常多。当时还有人写信给蒋委员长，说日本飞机怕什么，只要学了“剑仙”的飞剑，就用飞剑把飞机射下来，日本鬼子就完了。抗战精神可嘉，乱七八糟迷信的神话也太多。

我有一个朋友原来在西康的，后来我在台北碰到了，他请我吃饭，我问他：“听说你每次给蒋先生写完报告后，一定要在信尾写上，又在哪里碰到一个神仙了，又在哪里碰到一个剑仙了，叫老头子采用，可以来打日本人的飞机。”他说：“有啊，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当然知道，你当时不就摆了龙门阵的嘛”。然后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我怕蒋委员长‘忌才’啊，我以前写了很

多报告，言必有中，蒋先生都言听计从啊，我就一定会在后面写一些怪话，表现得怪诞，这样我就安全了。”

四川有个大学者叫刘师亮，北京大学名教授，连谢无量都很佩服他。当时四川军阀乱杀人，俗话说“乱剃头”，于是他写了一首剃头诗：“问道头可剃，人人都剃头，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且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意思是说：你要杀人，别人也就要杀你。

王国平：当时的中央军校在哪个位置？

南怀瑾：中央军校后门打开就是文殊院，我们当时就在武担山，山很小。我们教官住的地方就在皇城里头。中央军校真枪实弹不多。皇城一半是军校，一半是地方上的。

当时有很多老百姓都在想做皇帝。那一次，我当值星官，礼拜天，我带了十七八个学生值勤，看看没事，我就准备出去转转，他们说：“南教官，您忙您的，我们值就是了”。我就上街去了，到军校对面的街走了走，觉得没啥转头，就到其他街走一下，这个时候看到老百姓全部站在街两边，看热闹。五辆人力车拉着人正在街上飞快地跑，第一个人力车上高高地举了个杏黄旗，写了四个大字“替天行道”，后面车上红旗、绿旗飘。我问老百姓：“那些人是做什



本文作者王国平与南怀瑾先生在一起

么的?”回答说:“遂宁来的,想当皇帝,正攻皇城。”这一下,我赶快回皇城。

刚走到皇城门口,就看到五个人力车一直往皇城大殿冲。等一下,就听到枪响了。我问守卫的地方部队:“你们怎么开枪了?”回答说:“他们冲过我们的防线,我们就开枪了,先把人打死了再说,情况不明啊!”我进去一看,人都被打死了。干什么?想登上龙椅做皇帝。这一段的经历,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再摆一个四川的龙门阵。有一天,我和袁老师一起到成都去喝茶,就在东门的牛市口。我们两个人边喝茶边摆龙门阵,谈佛论道。这时,旁边桌子上也坐了几个人在喝茶。突然,一个人站起来,一只脚踏在板凳上,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说道:“狗日的,当年老子也是读过书的,后来家里穷啊,没有办法才学杀猪啊!那个猪杀死之后,就在猪腿上割一刀,用嘴巴对着刀口吹气,把猪吹胀,拿热水烫了之后才好刮毛,格老子我东一吹,西一吹,就把我一肚子的学问吹到猪肚子里去了。”你看四川人会不会骂人啊。袁老师听了,拿起一杯茶敬他说:“你哥子,骂得好!骂得好!”那个人说:“哦,我哪里是骂人哦,我讲的是真话!”

一个文人必须到过四川,一生才不会有遗憾。

我想念灌县、想念灵岩寺

王国平: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到灌县灵岩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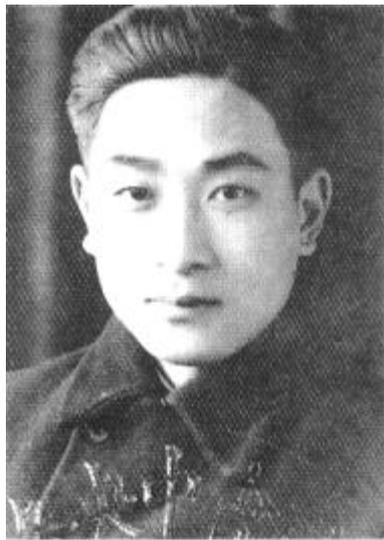
南怀瑾:民国三十一年(1942),我就在山上经传西法师介绍认识了袁老师。后来,冬天的时候,袁老师在山上组织一次“打七”活动,专门为我做的,就十来个人,不是四川一些报刊上说的上百人,那完全乱说的。

王国平:当时灌县离成都有点远,您是怎么去灌县的?

南怀瑾:坐车,当时有一条马路,也有了汽车,只不过路太烂了,坑坑洼洼的,跑得慢,票价记不得了。当时在四川大后方流行一首诗,是根据古诗改编的。原诗是这样写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经过四川人一改,就成了“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

王国平:当时的住持是传西法师。

南怀瑾:传西法师是我的老朋友,我在灌县的灵岩寺学佛。他那个时候还是华西大学的教授,一个和尚在华西大学讲课,讲的内容是《爱的哲学》,轰动一时啊。那个时候,灵岩山住的都是什么人?钱穆、冯友兰、李源澄、王恩洋、郭本道、曾子玉、程天放……李源澄当时在灵岩寺的下院铁佛寺办有一个书院,学生、老师都是他一个人,“艰



南怀瑾先生1940年在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十期

苦卓绝,始终不退”。

燕京大学的著名教授郭本道当时把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全套线装《道藏》搬到这里,不带过来不行啊,不带过来就会被日本人拿走。原来我看不到,这次看到了,平时我们哪里有机会看到那么多书啊!

王国平:听说冯友兰也在山上?

南怀瑾:冯友兰先生当时也在山上住了三个月,读了《指月录》,他下山以后去教书了,在重庆出版了《新原人》。

王国平:当时灵岩山上真的是名流汇集啊。

南怀瑾:灵岩寺本来是个小庙,抗战时期,一群避难的文化界朋友都来到这里,他们都是传西法师的朋友。灵岩山不住和尚,却住了一批文化人,老实讲啊,包括冯友兰、钱穆、袁老师、贾题韬啊,都



欠传西法师的情。我们吃他，住他，被他供养，我们也笑他，专门供养我们这一群文人。传西法师说，不管啦。他还非得要供养。我们四十年代在灵岩寺住了那一段，有感情啊！

我还有一个老朋友，也在灵岩寺呆过，跟着传西法师，现在九十多岁了，在成都文殊院住着呢，叫净天老和尚。听说他现在还记得我，还称我“南教官”。

四川的朋友是那么值得怀念

王国平：听说您在四川的朋友很多。

南怀瑾：成都的五老七贤，有几位是我的老朋友，其中一个七十多岁的刘豫波老先生，他的小砚台都还在我的手里。四川的朋友是那么值得怀念。我的老师袁焕仙就是四川有名的大德。离开四川后，我一直都很想念他，在台湾、香港和美国也时时牵挂。我试着联络写信给张怀恕，请她打听袁老师的下落。结果好几个月没有消息。后来收到她女儿秦敏初的回信，得知张怀恕已经死了。当时大陆的变化很大，那时的邮政局真了不起，经过两三个月辗转查访，终于把我的信送到张怀恕女儿的手里，我们都非常感谢这个邮差。秦敏初收到我的信非常高兴，她认得我，我离开四川时，她还是个高中生。后来，

她帮忙联系和打听到很多老朋友的消息。从她那里，我得知袁老师在文革开始时去世了。前不久，我在盐亭的凤灵寺为袁老师修建了一座灵塔。

四川有一个人叫刘杭生，后来到了台湾，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北大毕业的，当过抗战末期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我们那时在成都，大家都喊他“杭老”。刘杭生是个孝子，他到了台湾后住在四楼，妈妈八九十岁了，每天他都把妈妈背起，一级一级地下楼梯，到街上去转，晚上又背回来。刘杭生在台湾很穷，他虽做过财政部长，自己却没有钱。有一天，他给一个朋友写个条子，借三千元钱。干什么啊？他想去吃四川馆子。借到钱，刘杭生就到四川馆子去了，四川馆子的老板一看：“哟，杭老，您来啦！来干什么啊？”“吃饭。”“请客啊？”“没有，我一个人吃”。于是他就点了四菜一汤，也就是回锅肉，白菜之类。然后又让服务员给他买了一罐香烟，把烟罐打开，说：“我想成都啊。”吃完了以后，站起来就走了。四川馆子的老板连忙说：“杭老，您就走吧？”刘杭生说：“走吧！”老板说：“还没有找您钱哪。”杭老说：“给你们的小费。”他就这么潇洒。

成都东门外圣佛寺还有个光厚老禅师，光厚禅师不简单

啊，四川人都称他为“四川现代的活罗汉”。那时候，光厚禅师每日上午为人医病，其行医，不把脉，不开方，不教吃药。我给他的治疗方法命名为“以大拇指头烧病”。光厚禅师说大拇指中心为他修炼的三昧真火“火门”，真火自此火门出，按在病人之穴道上，一按一扬，一扬一按：好像蜻蜓点水一样。每一穴道，病重的人按二三十下，病轻的人按几下就可以了。你仔细一看，被按的穴道皮肤就红了一块，很神奇。

王国平：您老怀念四川吗？

南怀瑾：我跟这位刘（雨虹）老师多么怀念四川啊。四川是晚年最好居住的地方，比昆明、杭州……哪里都好，优哉游哉。

王国平：很想请您回四川走走。

南怀瑾：感谢你邀请我回四川。对不起，人怕老，老了以后，当年的老朋友一个个都没有啦，找不到老朋友了，跟很多人坐在一起，都无话可谈了。我从美国回到香港以后，还寻访到了一些四川的老朋友，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会给他们送礼金。现在很多老朋友都走了，还只剩一两个了。

（采访于2011年9月2日。作者为四川都江堰市文联副主席）

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文理学院燕京图书馆签署项目合作备忘录

2013年10月底,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文理学院燕京图书馆在互信共荣的基础上,经过充分的沟通,就哈佛大学哈佛文理学院燕京图书馆馆藏的善本中国地方志数字化事宜达成共识,签署项目合作备忘录。

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国地方志收藏宏富。据《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旧方志目录》统计,至2011年,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1949年前出版的原本方志共2922种30230册,其中明代32种、清代2305种、民国585种;收藏以胶片形式存在的缩微方志(不含以馆藏纸本方志拍摄的胶卷)441种,其中宋代5种、元代3种、明代376种、清代45种、民国12种。此外,还藏有1949年以来影印出版的大型方志丛书4521种,收藏新编地方志书约3.6万种,收藏以统计年鉴为主的各类中国年鉴约6000余种。馆藏明代刻本方志32种,清代方志中,有732种是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的善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这些善本中,有不少是稀有版本,如明嘉靖《吴江县志》《广西通志》,在国内各存2部,而万历《潞城县志》、崇祯《江阴县志》则是存世的孤本。其他如明万历《昆山县志》《武定州志》《华阴县志》、崇祯《乾州志》,以及清雍正《太原县志》等也十分罕见。有的方志有名家批点,如清康熙《常熟县志》,为清末帝师翁同龢所藏,第一册封面上有翁同龢手书书名,卷中多有批校和按语,为罕见之本。现存民国方志1100多种,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有585种,这些方志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此次签订的项目合作备忘录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美国哈佛大学哈佛文理学院燕京图书馆将其馆藏的全部善本中国地方志转化成数字化图像,并将图像刻录成光盘(此次数字化的善本中国地方志是指中国古代至清代前期刊印,即1795年以前的中国地方志),其他相关事宜也委托给美国哈佛大学哈佛文理学院燕京图书馆承做。鉴于善本中国地方志不存在版权归属及保护事宜,故工作成果不涉及版权归属问题。工作成果由双方共同享有,任何一方有权将工作成果无偿提供给本国学者及公民,以及世界各地学者研究使用。同时,此次双方所签备忘录所包含的工作成果,其用途仅限于学术研究和科研使用。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文理学院燕京图书馆都将承诺:任何一方不得将工作成果用于商业目的或者变相的商业用途;任何一方不得将工

作成果商品化、货币化。

这是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自恢复组建以来,与海外签订的第一个项目合作备忘录。该项目的签署对加强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国外方志收藏机构的联系与合作,促进方志研究,发展方志事业,弘扬方志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与文化意义。

(罗一洋)

省志编委召开2014年度《四川省志》拟复审终审分卷承编单位座谈会

2月21日,省志编委召开2014年度《四川省志》拟复审终审分卷承编单位座谈会。《中共志》《人大志》《政府志》《政协志》等32家列入2014年度《四川省志》计划复审终审分卷的承编单位代表和《四川省志》分卷各责任编辑、责任总编共计50余人参会。

会议就2014年度《四川省志》复审终审计划草案进行说明。32个分卷牵头承编单位代表分别介绍各分卷的编纂情况和存在问题。各分卷表示将按照2014年度《四川省志》工作计划要求按时提交复审或终审,希望省志编委各业务指导组继续全力支持各分卷的编纂指导工作,确保《四川省志》2014年度编纂任务的完成。部分《四川省志》分卷责任总编简要通报了业务工作完成情况。

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四川省志》总编马小彬通报了《四川省志》进展情况和部门志编纂情况:截至2014年1月31日,《四川省志》93部分卷已有33个分卷通过终审;省直部门有20个单位组织编纂了部门(或行业)年鉴,集存资料,服务当前的中心工作;省纪委、省直机关工委、省监狱管理局、四川博览局、省人防办、省红十字会等6家单位还开展了部门志的编纂。他指出:一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思想指导《四川省志》编修工作。二要依法修志,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和目标。要以新修订的《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为契机,全面推进《四川省志》的编纂工作。三要坚持标准和程序,确保志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要以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为指导抓好《四川省志》的编纂。

(牛 淼)

省志编委开展“4·20”芦山强烈地震抗震救灾志编纂培训

3月14日,“4·20”芦山强烈地震抗震救灾志编纂

培训会议在蓉举行，成都、雅安、眉山市地方志办公室及“4·20”芦山地震灾区芦山县、宝兴县、天全县等13个县（市、区）志办24人参加会议。省社科院灾害研究中心、省志编委省志工作处分别作“关于文献资料在灾害研究中的作用”“重大特殊事件专志编纂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专题讲座。会议就如何编纂好“4·20”芦山强烈地震抗震救灾志进行讨论，审核了《“4·20”芦山强烈地震大事辑要》征求意见稿。

省志编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罗亚夫强调，地震灾害志的编纂是地方志部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展工作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地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实施；要切实加强对“4·20”芦山强烈地震抗震救灾志编纂工作的领导，组建好编委会，选配好工作班子，组织召开好编纂工作动员会议；要加强对灾害类志书的编纂研究，推进工作科学化进程；要抓好志稿的审查验收工作，努力提高成果质量，为编纂出经世致用的高质量志书作出贡献。

参会代表分别通报工作进展，就工作组织方式、成果形式、经费保障、志稿审查等介绍经验、交流讨论，对《“4·20”芦山强烈地震大事辑要》提出补充完善意见。（李海毅）

成都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

3月19日，成都市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2013年全市地方志工作，对2014年全市地方志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认为，2013年，全市地方志系统紧紧围绕“抓主业、攻难关、建机制、转作风”，取得明显成效：以重启《成都市志（1990—2005）》编纂为标志，回归本位，修志编鉴工作全面推进；以公开出版《成都精览》口袋书，填补国内方志空白的《民俗方言志》“有声读物”为亮点，服务现实工作有声有色；面向“北改”工程、“财富论坛”、文态建设等推出的即时服务项目和成果可圈可点；全面实施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完成成都数字方志馆建设一期工程，于夯实地方志事业发展资源基础、占领中西部地方志信息化高地意义重大。

会议对2014年的工作任务作出安排：一是加强《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宣传落实，促进地方志工作法制化；二是进一步抓好第二轮修志工作；三是深入推进“数字方志馆”二期建设，全面深化资料年报制度实施工作；四是推动地方志工作服务现实；五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深化地校合作，与四川大学共同组

建中国方志研究中心和《华阳国志》研究协会，打造中国西部方志研究学术高地，为“文化之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

德阳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

3月14日，德阳市地方志工作会议在旌湖宾馆召开。会议通报了2013年全市地方志工作情况，对2014年地方志工作作出安排。会议还套开了志鉴工作培训会，对市志资料收集、专题稿件撰写和年鉴基础稿件撰写规范等进行业务知识培训。

省志编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孝平，市政府副秘书长姜俊出席会议。王孝平在讲话中肯定了德阳市地方志工作取得的成绩，传达了全国、全省地方志工作信息，希望德阳市地方志工作“承担更多任务，推出更多成果，发挥更大作用”。姜俊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地方志工作，促进地方志事业发展；各供稿单位要落实分管领导和撰稿人员，认真开展工作，做好《德阳年鉴（2014）》和市志长编的供稿工作。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泸州市“七二三”抗洪救灾志》出版发行

近期，《泸州市“七二三”抗洪救灾志》出版发行。该书由泸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全书共50万字，图片236幅，分为大事记、灾情、组织领导、抗洪力量、抢险救灾、受灾群众生活、医疗防疫、

灾后重建、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附录等章节，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了泸州市2012年“七二三”特大洪水抗洪抢险救灾、洪水灾害和灾后重建工作的全过程，对于科学总结经验，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提高防灾减灾工作水平，弘扬抗洪救灾精神，服务今后的抗洪、抢险、救灾、重建等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南充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

3月14日，南充市2014年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传达了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强调2014年抓好九项工作，即扎实搞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抓好新修订的《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学习贯彻；认真抓好省第十六次地方志成果申报及评奖；突出抓好志书编纂指导，出版发行《川北区志(1950-1952)》，全面完成全市第二轮志书编纂工作，启动《南充地方志志》编纂，有序开展旧志整理，指导部门志、专业志编纂工作；全面实现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切实抓好方志馆和地方志专业网站建设；加强地情资源开发，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拟编辑出版《南充当代楷模》；认真做好资料信息工作；切实抓好在职人员业务培训。提出着力解决地方志队伍专业人员缺乏、业务水平不高、敬业进取精神不强等几个制约全市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要求全市地方志工作者要切实担负起南充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历史重任，拥有良好心态，激发干事创业激情；要超前谋划工作，长短结合抓落实；要突出亮点和特色，树立有为才有位的观念；要多方争取支持，积极创造有利发展环境。

(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

巴中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

2月21日，巴中市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各县(区)志办主任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总结了全市2013年度工作，安排部署了2014年度工作任务：一是围绕改革大局，创新资政方式；二是围绕党政中心工作，服务地方加快发展；三是拓展党史地方志职能，扩大社会影响力；四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五是加强交流合作，扩大社会影响力，为全市2014年度开展好党史、方志重点工作增添新措施。各县(区)党史、志办主任分别作交流发言，

并对2014年度工作提出建议。



(巴中市地方志办公室)

巴中市推进地方志资料目录收集工作

为服务发展大局，传承地方优秀文化，巴中市志办按照省志编委工作要求，认真做好《四川省地方志目录(二)——巴中市地方志资料目录》收集汇编工作，主动作为，创新工作思路，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向各县(区)人民政府和市级各部门下发了《关于征集地方志资料目录的通知》，明确时间和任务，确定资料征集范围，细化报送要求，加大征集力度，确保资料征集工作有序有力推进。

(巴中市地方志办公室)

四川省千年古县专家组到合江县档案史志馆查核史志资料

2013年12月17日，四川省千年古县评审专家组到合江县进行实地考察。专家组在副县长林小勇的陪同下，到县档案史志馆对乾隆版、嘉庆版、同治版、民国版《合江县志》的历史记载进行核实，并翻阅了民国档案和其他历史资料，参观了县档案馆的库房和爱国主义教育展厅，对合江县档案史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合江县历史悠久，史料丰富，保存完好。

(刘忠安)

泸县挖掘利用地情资料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泸县地方志办公室于2013年3月起首次开展家谱、族谱和“龙桥寻踪”地情资料的征集，加强地方志资料库的建设，推进地方志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征集到家谱、族谱3部：《廖氏族谱》、《王氏族谱》、《艾姓源流和现代研究》；书刊3部：《龙腾三泸》、《泸州龙桥》、《泸县龙桥》；视频1部：《泸县龙桥探秘》以及龙桥故事、传说、趣闻、曲目等10余件。

(刘忠安)

